

暨南大学
JINAN UNIVERSITY



黄埔大道西观点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 601 号中惠楼
电话：020-85221755
官网：<https://iesr.jnu.edu.cn/>
微博：@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

REPORT

Center for Policy Research Annual Report 2019

年度报告

目录 Contents

关于我们	01
我们的工作	02
大事记	03
研究团队	04
<hr/>	
智库研究	11
<hr/>	
政策咨询	17
<hr/>	
政策传播	21
<hr/>	
品牌活动	48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

Institute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IESR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成立于2015年12月，是暨南大学为建设广东省高水平大学、推行经济学教育科研国际化而设立的教学科研机构。研究院坚持“以人为本，关注民生”的智库发展价值观，坚持走以数据为基础的独立、新型智库发展道路。2017年，研究院建立了政策研究中心。政策研究中心旨在数据收集及学术研究的基础上，针对有关国计民生的热点问题进行相关政策研究，提供高水平的智库服务。同年，研究院首次荣登核心智库榜单，成为全国16家“高校智库A类——211高校经济领域”的入选智库之一。2018年，研究院入选由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发布的核心智库榜单，排名进入全国社会类智库专业影响力前十名。2019年，研究院入选民政部政策理论研究基地，成为民政部在华南地区唯一的政策理论研究基地。同年，入选光明日报、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索引（CTTI）”来源智库。

我们的价值观

以人为本，关注民生

致辞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的智库研究基于自主的微观调查数据，致力于产出系列有影响力的政策性报告，为政府、公众、社会各界提供有料、有用、有深度的观点，启发民智，服务民众，创造有价值的思想产品。我们将及时把握国情脉络，系统总结中国经验，立足本土，放眼国际，力争将政策研究中心打造为国际知名、国内一流的独立专业的新型智库。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



我们的工作



智库研究

基于高质量的微观数据和国际水准的高水平论文，针对当下社会热点，聚焦民生领域，形成专业的智库观点、政策简报、调查报告等，为公众提供专业、客观的政策解读。



政策咨询

积极对接国家部委以及广东省的政策咨询需求，与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等国家部委，广东省委改革办、民政厅以及广州市政府展开深度合作，提供政策咨询服务，产出多项具有政策价值的课题成果。



政策传播

积极与媒体合作，通过发表文章、媒体论坛传播 IESR 声音，扩大社会影响力，凝聚共识。依托自媒体平台“黄埔大道西观点”微信公众号，传播与学术研究紧密结合的政策文章。



品牌活动

依托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高质量、国际化的学术平台，举办“问政暨南”、“暨南论道”、“IESR+”以及各类政策研讨会，共商社会发展热点问题，凝聚各方观点精华。

2019 大事记

2019年1月,《2018年中国智库报告——影响力排名与政策建议》社会类智库专业影响力排名第十。

2019年1月,《广东千村调查2018年研究报告》发布。

2019年3月,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2019年4月,举办首届“调研南粤·美在乡村”大学生乡村调研大赛颁奖仪式。

2019年4月,入选民政部政策理论研究基地,冯帅章教授担任基地负责人。

2019年6月,《南粤炊烟——2018广东千村调查实录》新书发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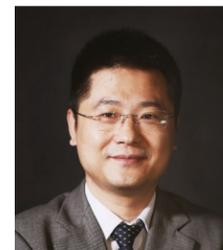
2019年9月,冯帅章教授受聘为第一届广东乡村振兴咨询委员会委员。

2019年10月,首届“布鲁金斯-暨南”中国微观经济学论坛召开。

2019年12月,正式入选光明日报、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索引(CTTI)”来源智库。

研究团队

中心负责人



冯帅章

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政策中心主任,教授
康奈尔大学博士
研究领域:劳动经济学



张思思

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副院长,政策中心执行主任,副教授
波士顿学院博士
研究领域:劳动经济学,城市经济学,房地产经济学

特聘研究员



韩嘉玲

特聘研究员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研究领域:农村教育,妇女与发展,人口迁徙,流动儿童教育等

专职研究员



韩昱洁
助理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博士
研究领域:教育经济学,劳动经济学,农业经济学



李承政
助理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博士
研究领域:农业经济学,资源经济学,发展经济学



李书娟

助理教授

中山大学博士

研究领域：政治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环境经济学



崔潇濛

助理教授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博士

研究领域：环境经济学，农业经济学，资源经济学



卢晶亮

副教授

上海财经大学博士

研究领域：劳动经济学



谷佳家

助理教授

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

研究领域：宏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



唐高洁

助理教授

上海财经大学博士

研究领域：应用经济学，劳动经济学，卫生经济学



谷一桢

副教授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

研究领域：城市经济学，交通经济学

兼职研究员



薄诗雨

助理教授

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

研究领域：发展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城市经济学，区域经济学



郭文殊

助理教授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博士

研究领域：产业组织



蔡澍

副教授

香港科技大学博士

研究领域：发展经济学，劳动经济学



金濬熒

助理教授

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

研究领域：劳动经济学，家庭经济学



陈思宇

助理教授

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

研究领域：劳动经济学，环境经济学，金融经济学



李润梁

助理教授

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大学博士

研究领域：金融经济学，环境经济学



陈祎

副教授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博士

研究领域：劳动经济学，家庭经济学，人口经济学，教育经济学



林威

助理教授

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博士

研究领域：计量经济学，劳动经济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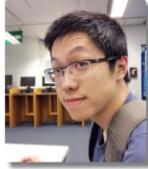


刘丛

助理教授

亚利桑那大学博士

研究领域：经济史，发展经济学



刘珂

助理教授

香港科技大学博士

研究领域：产业组织，博弈论



刘诗濛

助理教授

美国雪城大学博士

研究领域：城市经济学，区域经济学，房地产经济学，劳动经济学



马森

助理教授

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 - 香槟分校

研究领域：发展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家庭经济学，国际经济学



马祥

助理教授

耶鲁大学博士

研究领域：发展经济学，农业经济学



朴珍成

助理教授

田纳西大学博士

研究领域：劳动经济学，公共经济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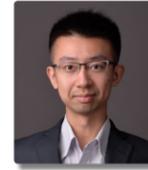


邱筠

助理教授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博士

研究领域：环境经济学



史炜

副教授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博士

研究领域：计量经济学，城市经济学，房地产经济学



宋彦

助理教授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博士

研究领域：卫生经济学，教育经济学，劳动经济学



苏应俊

助理教授

匹兹堡大学博士

研究领域：产业组织



唐立鑫

副教授

马里兰大学博士

研究领域：国际经济学，发展经济学



唐曲

助理教授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

研究领域：环境经济学，产业组织



王武毅

助理教授

新加坡管理大学博士

研究领域：计量经济学



谢斌

助理教授

罗格斯大学博士

研究领域：劳动经济学，经济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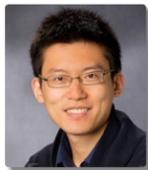
谢佳欣
助理教授

香港科技大学
研究领域：发展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教育经济学



徐吉良
副教授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博士
研究领域：计量经济学，劳动经济学



薛森
助理教授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博士
研究领域：劳动经济学，发展经济学



严子中
助理教授

英国华威大学博士
研究领域：计量经济学、教育经济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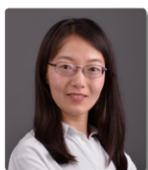
杨尚铭
助理教授

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
研究领域：城市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房地产经济学



杨哲
助理教授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博士
研究领域：家庭经济学，卫生经济学，劳动经济学



殷立娟
助理教授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博士
研究领域：国际经济学



张毅
助理教授

波士顿大学博士
研究领域：计量经济学



赵胤浩
助理教授

墨尔本大学博士
研究领域：宏观经济学，房地产经济学，劳动经济学



朱宏佳
助理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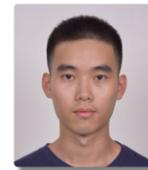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博士
研究领域：城市经济学，房地产经济学，环境经济学

全职研究助理



谢慧如
研究助理

华南理工大学硕士



余家庆
研究助理

中山大学硕士



张亚楠
研究助理

华中师范大学硕士



智库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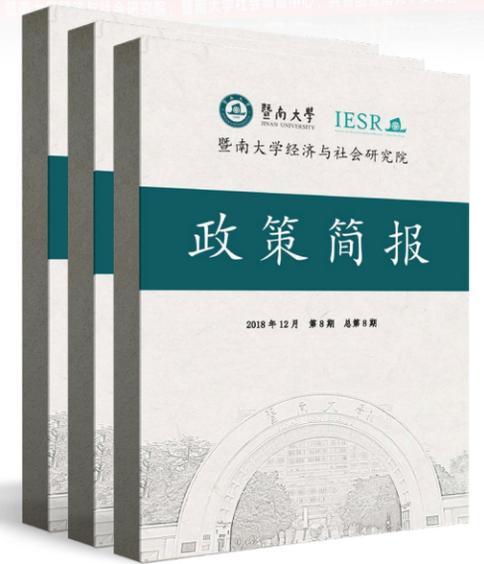
基于高质量的微观数据和国际水准的高水平论文，针对当下社会热点，聚焦民生领域，形成专业的智库观点、政策简报、调查报告等，为公众提供专业、客观的政策解读。

1

乡村振兴

为响应党和国家的乡村振兴战略，全面了解农业和农村发展现状及农民生活现状，科学评估支农惠农相关政策的初步效果，并提出切实可行的乡村振兴方案，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连续两年开展广东千村调查，基于村级和户级层面的调查数据，围绕精准扶贫、农村教育、农村生态环境、乡村基层治理、农村金融等领域进行一系列的学术及政策研究。

2019年1月，《广东千村调查2018年研究报告》正式发布。在完整报告基础之上，另形成6份政策简报。其中，韩昱洁撰写的《促进农村教育公平，助力广东乡村振兴事业》获得广东省委办公厅采纳；李承政撰写的《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完善广东农村卫生公厕建设》与牛梦琦撰写的《动态瞄准扶贫目标，夯实广东精准扶贫工作》获得省委办公厅批示。2019年6月，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南粤炊烟——2018广东千村调查实录》正式出版，该书是2018广东千村调查的最完整记录。



乡村振兴领域相关成果



- 调查报告 广东千村调查2018年研究报告
- 书籍 南粤炊烟——2018广东千村调查实录调查报告
- 政策简报 动态瞄准扶贫目标，夯实广东精准扶贫工作
- 政策简报 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完善广东农村卫生公厕建设
- 政策简报 促进农村教育公平，助力广东乡村振兴事业
- 政策简报 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奠定乡村振兴基石
- 政策简报 产业共建助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粤东西北人口城镇化
- 政策简报 着力农村环境突出问题，实现广东乡村可持续发展
- 政策简报 加大广东农地流转供给侧改革，促进农地流转市场均衡发展
- 观点评论 盘活资源促乡村产业发展

2

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

中国城乡人口流动背景下的留守儿童问题早已引起政府关注。2019年10月，研究院连续第4年受民政部委托，赴浙江省开展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第三方评估以进一步督促做好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困境儿童保障等相关工作，确保国务院部署的“合力监护、相伴成长”关爱保护专项行动落到实处。同时，研究院开展了绵竹儿童认知与非认知能力发展追踪项目，研究留守经历对留守儿童认知和非认知能力的影响，并为解决留守儿童问题提供科学的实证证据。项目参与者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2019年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詹姆斯·赫克曼教授及美国知名智库 Mathematica Policy Research 研究员 Tim Kautz。



流动儿童在城市中面临的最主要困境是教育问题，据《中国流动儿童教育发展报告（2016）》显示，截至2014年底，城市义务教育阶段流动儿童在公办学校就读比例为79.5%，仍有超过200万名流动儿童只能在民办学校或者条件简陋的打工子弟学校就读。与此同时，特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的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入学条件在愈发严苛，流动儿童面临无学可上或回到老家成为留守儿童的困境。研究院积极探究流动子女义务教育政策对流动儿童的学习成绩、社会融入、情感等短期影响，追踪政策对升学、健康和就业的长期影响。2019年4月，研究院连续第三次主办“全国流动人口子女学术研讨会暨政策论坛”，邀请政府、学术机构、公益机构等专家、学者共商流动人口子女教育发展大计。

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领域相关成果

- 学术论文 The Effect of Primary School Type on the High School Opportunities of Migrant Children in China.
- 学术论文 The Education of Migrant Children in China's Urban Public Elementary Schools: Evidence from Shanghai
- 调查报告 绵竹儿童认知与非认知能力发展追踪项目 2018 数据成果报告
- 调查报告 2019 年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困境儿童保障工作 第三方评估报告
- 观点评论 一石三鸟：加强婴幼儿照护正当其时
- 观点评论 关注留守家庭，让孩子感受更多的温暖与爱
- 观点评论 公办还是民办？流动儿童义务教育阶段的挑战
- 观点评论 破除非户籍子女上学难问题，公共服务何日不再短缺？
- 会议摘编 第三届全国流动人口子女学术研讨会主题发言摘编



3

流动人口

中国城乡、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所引致的人口流动问题一直以来都是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热点，研究团队深度探析人口流动与城市经济发展、不同地区人口政策如户籍制度的影响机制等实际问题，并与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合作开展了“人口与经济发展”、“人口与中等收入陷阱”等课题，研究人口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人口政策发挥的影响以及处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面临的各类人口问题。同时，社会调查中心开展“中国城乡人口流动调查”和“广东人口流动现状调查”，搜集城乡流动人口的基本人口特征、健康、教育、就业、社会关系网络、家庭收支、居住条件和老家信息，分析城乡流动人口健康、教育、就业、劳动力市场以及居住情况的影响因素，从而了解促进其生活水平提高的因素。



流动人口领域相关成果

- 学术论文 Social Networks and Mental Health Outcomes: Chinese Rural-urban Migrant Experience
- 观点评论 Can Information Influence the Social Insurance Participation of China's Rural Migrants?
- 政策简报 中国流动人口住房问题研究
- 研究报告 广东人口资源趋势与融合发展机制研究
- 会议摘编 “外来人口市民化”研讨会观点集萃



4

区域发展与住房政策

研究院研究团队积极对房地产市场最新政策变化进行及时解读，探讨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研究住房金融政策发展，用房地产真实交易数据构造同质住房指数研究房价波动，并研究房地产市场的价格波动和住房制度变迁对社会经济及个体行为的影响。结合人口城镇化，本中心还研究推进农民工和农民进城购房安居相关政策。中心的住房政策研究获得国家及广东省多项课题资助。



区域发展与住房政策领域相关成果

- 学术论文 Centralizatio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Evidence from a Political Hierarchy Reform to Create Cities in China
- 调查报告 2019 中国上市房企 60 健康指数(与南方日报联合推出)
- 研究报告 当前房地产市场发展趋势与广州应对策略研究
- 观点评论 点评《广东长租公寓发展报告 2018》
- 观点评论 解读“住宅应以套内面积交易”政策
- 观点评论 “地铁热”能缓解路面交通拥堵吗
- 观点评论 中国个人所得税制的隐性区域不平等
- 会议摘编 “中国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转型、发展与挑战”圆桌论坛观点集锦



5

其他民生领域

作为民政部政策理论研究基地，研究院研究团队聚焦民生领域热点问题。包括探讨中美贸易战对珠三角地区就业生活影响，以探讨提供托底性民生保障政策；进一步研究低保边缘群体的界定，进行将低保边缘群体纳入低保的可行性研究。此外，还包括就业质量动态监测、产业发展趋势研究等。



其他民生领域相关成果



- 研究报告 将低收入群体纳入低保的可行性研究
- 研究报告 托底性民生保障政策支持系统建设研究
- 研究报告 就业质量动态监测专题研究
- 观点评论 转基因正在敲门，中国要避免被动接受
- 观点评论 师范生公费教育缓解信贷约束，吸引高分考生
- 观点评论 “方言”真的阻碍经济发展吗？
- 研究报告 农村淘宝为每村带来 18 万元 / 年的福利收益
- 观点评论 共享单车能走多远？
- 观点评论 供需不平衡导致中小学校外培训热，教育招考制度改革是根本解决途径
- 观点评论 “3+1+2”方案下，化学可能成为物理之后的遇冷科目
- 观点评论 “水果自由”背后的关注点不应只是简单的供需关系
- 观点评论 人口质量比生育率更值得关注
- 观点评论 互联网+教育如何在欠发达地区推广？——基于英语教学应用在陕西省推广的实地调研分析
- 观点评论 高考录取平行志愿取代梯度志愿，是一种进步吗？
- 观点评论 决定你高考分数的可能还有温度和空气污染
- 观点评论 网络购物能降低区域消费不平等吗？

与国家民政部、广东省民政厅合作关注民生问题

2019年，研究院与国家民政部等部门进一步深化合作。2019年5月，研究院入选民政部政策理论研究基地，系民政部在华南地区的唯一一家政策理论基地。基地成立以来，承接了民政部托底性民生保障政策支持系统建设研究、将低收入群体纳入低保的可行性研究等横向课题。同时，第四次受民政部委托，开展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困难儿童保障评估工作。相关研究都已形成研究报告。针对民生类热点问题，研究院也及时递交多份政策简报和基地专报至民政部。



政策咨询

积极对接国家部委以及广东省的政策咨询需求，与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等国家部委，广东省委改革办、民政厅以及广州市政府展开深度合作，提供政策咨询服务，产出多项具有政策价值的课题成果。



与国家统计局合作关注劳动就业数据



2019年，研究院与国家统计局也进一步深化合作。研究院受国家统计局委托研究我国城镇地区就业质量的变动趋势，利用2016-2018年月度劳动力调查数据完成了就业质量动态监测研究报告。报告获得统计局有关领导肯定，双方有计划对2019年及以后的就业质量变化继续开展监测。

与广东省委改革办合作关注人口趋势



目前一方面广东存在人口老龄化程度有所加重，生育率不断下降，外来人口流入规模增速有所放缓，省内人口的区域分布依然不平衡等现象；另一方面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一核一带一区”区域发展新格局的构建，又为广东的经济发展与人口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研究院受广东省委改革办委托，完成课题《广东人口资源趋势与融合发展机制研究》。对广东如何提振生育率，平衡教育资源分布，进一步打造人才强省，优化人口区域分布，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加强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

与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合作关注乡村振兴

基于2018年广东千村调查，研究院发布了《广东千村调查2018年研究报告》，并出版了专著《南粤炊烟——2018广东千村调查》。报告与书籍的出版发布都受到了广东省农业农村厅的大力支持。同时，基于完整报告，研究院向广东省委办公厅递交了多份政策简报。其中，《促进农村教育公平，助力广东乡村振兴事业》获得采纳，《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完善广东农村卫生公厕建设》与《动态瞄准扶贫目标，夯实广东精准扶贫工作》获得了批示。



与广州市政府合作关注房地产市场发展



2019年，研究院院长冯帅章教授受聘为广州市人民政府第四届决策咨询专家，为广州市政府提供宏观经济和战略发展决策咨询。同时，研究院承接了广州市政府关于当前房地产市场发展趋势与广州应对策略研究课题。课题组将现有数据与实地调研相结合，评估广州市各项住房政策的最新实施状况和效果，为广州市房地产调控和稳定房地产业发展提供分析及政策建议。



政策传播



研究院智库微信公众号“黄埔大道西观点”是智库发声平台，拥有国际视野、实证基础以及政策导向，为公众提供专业、丰富、客观的优质观点和智库产品。

2019 年自媒体发表

“黄埔大道西观点”推送图文消息共 **74** 条

平台粉丝比上一年度增长近 **60%**

观点评论文章发表 **46** 篇

2019 年权威媒体报道

权威媒体共发布教师观点文章共 **22** 篇。

接受权威媒体采访共 **6** 次。

2019 “黄埔大道西观点”观点类文章一览

“规范化”与“严格监管”合力规范社交电商发展	2019-01-03	张毅
供需不平衡导致中小学校外培训热，教育招考制度改革是根本解决途径	2019-01-09	李书娟
网络购物平台对“市场”的革新及其未来	2019-01-15	杨尚铭
IESR 学者解读 2019 广东政府工作报告	2019-01-30	冯帅章等
中国个人所得税制的隐性区域不平等	2019-02-27	刘诗濛
计划生育政策如何改变中国老年人的生活？	2019-03-18	陈祎
公办还是民办？流动儿童义务教育阶段的挑战	2019-03-20	冯帅章 韩昱洁
用气象大数据支持农业发展需要“上天下地”	2019-03-25	崔潇濛
你知道吗？家庭地位和数学水平都影响了你的个税抵扣	2019-04-02	宋彦
为什么广东省东翼地区农地流转率低，租金高？	2019-04-04	李承政
农村电子商务扶贫是精准脱贫的有效途径	2019-04-10	王武毅
平行志愿减少 6% 的错配，出分报考减少 18% 的错配	2019-04-11	薄诗雨
关注留守家庭，让孩子感受更多的温暖与爱	2019-04-25	冯帅章
挡不住的网红经济：空前爆发下的隐忧	2019-05-06	严子中

加强婴幼儿照护正当其时	2019-05-10	冯帅章
都挺好？看重男轻女如何影响父母时间分配	2019-05-13	薄诗雨
中国流动人口住房负担调查	2019-05-15	张思思
“3+1+2”方案下，化学可能成为物理之后的遇冷科目	2019-05-21	陈祎
盘活资源促乡村产业发展	2019-05-27	马祥
“水果自由”背后的关注点不应只是简单的供需关系	2019-05-29	张毅
人口质量比生育率更值得关注	2019-06-10	谷佳家
贸易战升级：中国产能会转移到东南亚吗	2019-06-14	殷立娟
互联网+教育如何在欠发达地区推广？——基于英语教学应用在陕西省推广的实地调研分析	2019-06-21	马森
高考录取平行志愿取代梯度志愿，是一种进步吗？	2019-06-26	宋彦
中国家庭就业调查：看看哪些行业加班多	2019-06-28	薛森 何李芮
开放与透明应成为中国页岩气产业的发展趋势	2019-07-03	郭文殊
决定你高考分数的可能还有温度和空气污染	2019-07-05	唐曲
了解你不知道的“厕所革命”	2019-07-08	张亚楠
网络购物能降低区域消费不平等吗？	2019-07-09	唐立鑫
垃圾分类要与垃圾运输、处理等能力匹配	2019-07-10	李承政 张亚楠
破除非户籍子女上学难问题，公共服务何日不再短缺？	2019-07-18	余家庆
全球变暖或扩大社会不平等	2019-07-25	邱筠
以功能性产业政策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2019-07-26	苏应俊
降息渐成不可持续货币政策	2019-08-03	李润梁
人工智能时代反垄断监管需警惕算法合谋风险	2019-08-07	刘珂
共享单车能走多远？	2019-08-21	林威
农村淘宝为每村带来 18 万元 / 年的福利收益	2019-09-02	谷一桢
推广分配性国民经济核算——托马斯·皮凯蒂的雄心壮志	2019-09-06	卢晶亮

美国《排华法案》与华人的反歧视抗争史	2019-09-11	谢斌
师范生公费教育能缓解信贷约束，吸引高分考生	2019-09-20	谢佳欣
广州建设共有产权住房，为大湾区做好人才储备	2019-09-26	谢慧如
中国男足真的落后吗？来自经济学文献的证据	2019-10-09	卢晶亮
“方言”会阻碍经济发展吗？	2019-11-26	马森
转基因正在敲门，中国要避免被动接受	2019-12-04	崔潇濛
农村小规模学校蝶变与探索的中国经验	2019-12-18	韩嘉玲
HFI-60 指数与房地产业未来四大潜在增长点	2019-12-27	张思思

2019 “ 黄埔大道西观点 ” 会议摘编一览

“外来人口市民化”研讨会观点集萃	2019-11-21
贺丹：关注人工智能对我国劳动就业的多重影响	2019-12-12
江飞涛：中国产业政策的制定程序与组织机制——揭开中国产业政策制定的“黑箱”	2019-03-29
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会影响贫困等社会问题的代际延续 ——第三届全国流动人口子女学术研讨会主题发言摘编	2019-04-26
诺奖得主皮萨里德斯：新技术发展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2019-05-24
齐晔：中国能源转型及其治理变革现状问题	2019-04-28
随迁子女入学、教育、营养……第三届流动人口子女政策论坛观点集萃	2019-04-25
汪三贵：精准扶贫的现状和未来	2019-09-12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 Robert Moffitt 谈如何衡量贫困	2019-06-12
中国增长模式转型再认识：一个环境经济学视角	2019-09-27

2019 “ 黄埔大道西观点 ” 报告发布一览

韩昱洁：促进农村教育公平，助力广东乡村振兴事业	2019-01-29
李承政：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完善广东农村卫生公厕建设	2019-01-30
李承政：着力农村环境突出问题，实现广东乡村可持续发展	2019-02-03
李书娟：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奠定乡村振兴基石	2019-02-01
卢晶亮：产业共建助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粤东西北人口城镇化	2019-02-02
牛梦琦：动态瞄准扶贫目标，夯实广东精准扶贫工作	2019-01-31
广东千村调查 2018 研究报告完整版网络首发	2019-02-03
了解广东省制造业，看这一篇就够了	2019-02-01

2019 “ 黄埔大道西观点 ” 手记一览

在十里稻香中感受中国乡村大地的每一次脉动	2019-07-31	张亚楠
子女在，不远游？——浙江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流动儿童保障评估工作手记	2019-10-23	余家庆

权威媒体报道一览

转基因正在敲门，中国要避免被动接受	2019-12-4	澎湃新闻
The Unintended Impacts of Agricultural Fires: Human Capital in China	2019-12-4	Voxchina
“方言”会阻碍经济发展吗？	2019-11-26	澎湃新闻
E-Commerce Development and Household Consumption Growth in China	2019-9-4	Voxchina
气候变暖或扩大社会不平等	2019-7-23	澎湃新闻
网络购物能降低区域消费不平等吗？	2019-7-9	财新网
决定你高考分数的可能还有温度和空气污染	2019-6-26	澎湃新闻

高考录取平行志愿取代梯度志愿，是一种进步吗？ 深度解读	2019-6-26	腾讯今日话题
贸易战升级：中国产能会转移到东南亚吗	2019-6-14	财新网
为什么实现不了“水果自由”？专家：真不是因为钱少	2019-5-24	羊城派
盘活资源促乡村产业发展	2019-5-17	经济日报
“3+1+2”方案下，化学可能成为物理之后的遇冷科目	2019-5-13	羊城派
网红经济的门道	2019-5-11	澎湃新闻
中国流动人口住房负担调查	2019-5-13	澎湃新闻
都挺好？看重男轻女如何影响父母时间分配	2019-5-10	财新网
一石三鸟：加强婴幼儿照护正当其时	2019-4-16	澎湃新闻
Can Information Influence the Social Insurance Participation of China's Rural Migrants?	2019-4-10	VoxChina
用气象大数据支持农业发展	2019-4-10	中国社会科学报
Accounting for Urban China's Rising Income Inequality: The Roles of the Labor Market, Human Capital, and Marriage Market Factors	2019-3-27	VoxChina
平行志愿减少 6% 的错配，出分报考减少 18% 的错配	2019-3-26	财经网
女性公平就业难，职场离性别真正平等还有多远	2019-3-20	财新网
公办还是民办？流动儿童义务教育阶段的挑战	2019-2-27	澎湃新闻

接受权威媒体采访情况一览

HFI-60 指数与房地产业未来四大潜在增长点	2019-12	南方日报
乡村振兴期待金融活水——广东农村金融市场状况调查	2019-5-24	经济日报
水果变“贵”族 价格涨涨涨？	2019-5-21	广州日报
专家点评《广东长租公寓发展报告 2018》，应尽快落实政策要求给企业实质扶持	2019-4-22	南方日报
我们分析了 10 份政府工作报告，优化营商环境广东今年将这么干	2019-3-4	南方都市报
多位专家解读、起草单位发声：“按套内面积交易”旨在解决这个问题	2019-2-24	南方 +

2019年 权威媒体共发布教师观点文章共 22篇

贸易战升级：中国产能会转移到东南亚吗

2019年06月14日 12:02 来源于 财新网

产能转移早已开始，但东南亚还没准备好，短期难以取代中国。如果产能能迁到东南亚国家，企业将不得不面对巨大障碍



当地时间2019年3月1日，越南北宁省，工人在一服装厂内工作。早在去年9月美国实施新一轮制裁之前，包括中国公司在内的外国企业就已在越南布局，目的就是利用越南的廉价劳动力和有利的商业环境。图/视觉中国

文 | 殷立娟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

从去年1月美国对进口太阳能电机加征关税开始，到今年5月10日对中国2000亿美元商品的关税水平，共挑起了七轮关税冲突。中国企业以

为什么实现不了“水果自由”？专家：真不是因为你不钱少

2019-05-28 16:23 羊城派

“水果自由”背后的关注点不应只是简单的供需关系

“水果太贵”、“吃不起水果”、“水果自由”成为了近日最热门的讨论话题之一。网友们纷纷抱怨水果价格走高，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继续吃到便宜的水果了。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1-3月，鲜果类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比上年同期分别上涨了5.9%、4.8%、7.7%，4月份更是达到了“惊人”的11.9%。

众多媒体纷纷开始报道分析水果涨价的原因，天气原因导致减产与消费升级成为了本轮涨价的主因。

以苹果为例，去年的极端天气导致了产量低，能满足在零售终端销售的商品果糖缺，加之新一季的苹果还没有上市，使得供给小于需求，

好的不平等，还是坏的不平等：以中国劳动力市场化改革为视角

冯科/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
2018-12-25 10:33 来源：澎湃新闻



2014年12月05日，广东省东莞市，无尘洁净室车间，工人在工厂生产电脑硬盘。视觉中国

不平等也有好坏之分。按照诺贝尔得主James Heckman的说法，凡是提高劳动技能报酬，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带来的不平等，应归为“好的”不平等。因为技能报酬的提高可以让劳动者有更强烈的动机去提高自己的技能水平，从而增加整个社会的产出。反之，凡是因出生、外部环境、制度等原因而限制人们获取技能，以及限制技能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相应回报而产生的不平等，应该被归为“坏的”不平等。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与国企改革同步的城镇劳动力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上升很快。然而，不平等上升的原因为何，究竟是好是坏，却

乡村振兴期待金融活水

——广东农村金融生态调查

盘活资源 促进乡村产业发展



乡村振兴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重大战略部署。金融活水是乡村振兴的“血液”，也是乡村振兴的“引擎”。广东农村金融生态调查，旨在了解广东农村金融生态现状，为乡村振兴提供金融支持。

调查发现，广东农村金融生态呈现出“总量增长、结构优化、服务提升”的特点。农村金融总量持续增长，农村金融结构不断优化，农村金融服务水平不断提升。

然而，农村金融生态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如农村金融覆盖率低、农村金融可得性差、农村金融成本高等。这些问题制约了农村金融对乡村振兴的支持作用。

为破解农村金融难题，广东农村金融生态调查提出以下建议：一是加大农村金融投入，二是优化农村金融结构，三是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水平，四是创新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五是加强农村金融监管。

都挺好？看重男轻女如何影响父母时间分配

2019年05月10日 14:52 来源于 财新网

了解性别不平等的世代循环，社会政策一方面需要干预劳动力市场、维护职场上的性别平等；另一方面还需要确保女性从童年时期就受到平等的对待，通过投入更多的社会资源帮助女性得到健康的成长



2018年6月9日，湖北咸宁，兄妹俩在玩耍。重男轻女文化影响了女性的经济地位因素，反过来再生产出重男轻女的社会文化，形成一个性别不平等的循环命题。图/视觉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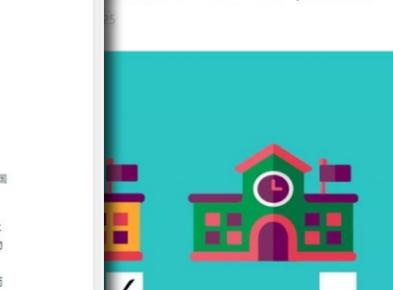
文 | 薄诗雨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

中国传统社会的家庭规范向来重男轻女。在小农经济时代，其原因无非有二：从文化上，儿子可以传承香火，延续香火；从功能意义上，儿子不仅需要挑起农业生产重任，还要赡养父母。因此，与“养儿防老”相比，外嫁的女儿更像是“泼出去的水”，她们无法参与家庭的生产与照顾工作。由于生男生女的效用并不一致，不少家庭在生育、养育等问题上，更倾向于重男轻女的方式。例如，在近日一部讲述原生家庭对子女影响的电视剧《都挺好》中，重男轻女的家庭，对儿子投入更多的情感关爱与物质资源，却对女儿苏明玉不闻不问，甚至剥夺了苏明玉的受教育权。

自然村手机4G网络覆盖率达91%！粤千村调查研究报告发布

广东教育头条 南方+ 01-10 22:34

1月10日，《广东千村调查2018年研究报告》（简称《报告》）发布会暨村长圆桌论坛在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举办，发布了村庄概况与生态环境、乡村就业与收支、乡村治理、精准扶贫与一村一品、乡村教育、农村金融6个方面的研究报告和发现，并为获得“广东千村调查先进单位”的村委颁奖。



《广东千村调查2018年研究报告》发布会现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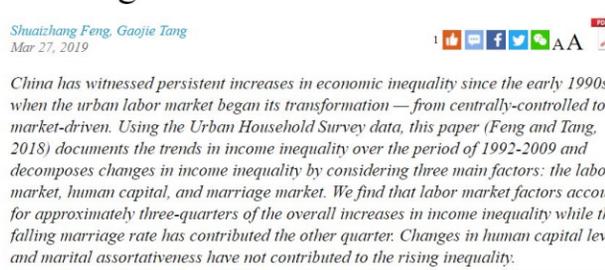
自然村手机4G网络覆盖率达91%！粤千村调查研究报告发布

《广东千村调查2018年研究报告》发布会暨村长圆桌论坛在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举办，发布了村庄概况与生态环境、乡村就业与收支、乡村治理、精准扶贫与一村一品、乡村教育、农村金融6个方面的研究报告和发现，并为获得“广东千村调查先进单位”的村委颁奖。

Accounting for Urban China's Rising Income Inequality: The Roles of the Labor Market, Human Capital, and Marriage Market Factors

Shuaizheng Feng, Gaojie Tang
Mar 27, 2019

China has witnessed persistent increases in economic inequality since the early 1990s when the urban labor market began its transformation — from centrally-controlled to market-driven. Using the Urban Household Survey data, this paper (Feng and Tang, 2018) documents the trends in income inequality over the period of 1992-2009 and decomposes changes in income inequality by considering three main factors: the labor market, human capital, and marriage market. We find that labor market factors account for approximately three-quarters of the overall increases in income inequality while the falling marriage rate has contributed the other quarter. Changes in human capital levels and marital assortativeness have not contributed to the rising inequality.



农村金融“欠发达”现象严重

广东千村调查2018年研究报告

本报告显示，农村金融“欠发达”现象严重。农村金融覆盖率低，农村金融可得性差，农村金融成本高等。这些问题制约了农村金融对乡村振兴的支持作用。



农村金融“欠发达”现象严重

本报告显示，农村金融“欠发达”现象严重。农村金融覆盖率低，农村金融可得性差，农村金融成本高等。这些问题制约了农村金融对乡村振兴的支持作用。

自然村手机4G网络覆盖率达91%！粤千村调查研究报告发布

广东教育头条 南方+ 01-10 22:34

1月10日，《广东千村调查2018年研究报告》（简称《报告》）发布会暨村长圆桌论坛在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举办，发布了村庄概况与生态环境、乡村就业与收支、乡村治理、精准扶贫与一村一品、乡村教育、农村金融6个方面的研究报告和发现，并为获得“广东千村调查先进单位”的村委颁奖。



《广东千村调查2018年研究报告》发布会现场。

中国个人所得税制的隐性区域不平等

刘诗涛/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
2019-02-27 10:25 来源：澎湃新闻

2018年8月3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第七次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与此前几个税法改革相比，新个税法改革力度大，涉及面广，切合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更好地保障了社会的公平性。个人所得税与每位公民息息相关，因此本次个税法改革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热烈的讨论。本文依据新个人所得税法，讨论目前中国实行的全国统一个人所得税制的隐性区域不平等等问题，希望为关系国计民生的政策讨论贡献一份力量，为中国个人所得税制的后续改革提供新的思路。

本次个税法改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 第一，收集无住所居民个人判断标准概念。相比之前以无住所个人是否经常收报了居民个人的时间判定标准，规定。
- 第二，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并适用统一的超额累进税率。对综合所得分类，并适当调整了各档税率。
- 第三，建立综合所得扣除机制。项目不再保留专项附加扣除费用，外，还增加了赡养老人、子女教育、继续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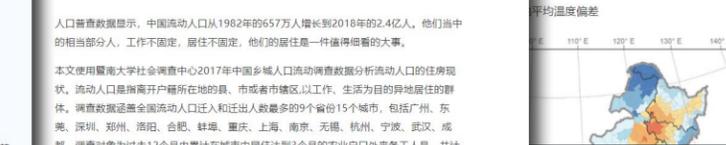
暨南大学 | 中国流动人口住房负担调查

张恩恩
2019-05-13 15:05 来源：澎湃新闻

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流动人口从1982年的657万人增长到2018年的2.4亿人。他们当中的相当部分人，工作不固定，居住不固定，他们的居住是一件值得细看的大事。

本文使用暨南大学社会调查中心2017年中国城乡人口流动调查数据，分析流动人口的住房现状。流动人口是指离开户籍所在地的县、市或者镇区，以工作、生活为目的异地居住的群体。调查数据涵盖全国流动人口迁入和迁出人数最多的9个省份15个城市，包括广州、东莞、深圳、郑州、沈阳、合肥、蚌埠、重庆、上海、南京、无锡、杭州、宁波、武汉、成都、南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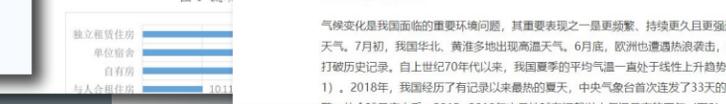
根据调查数据，流动人口住房负担沉重。流动人口住房租金占收入比例高，自有住房比例低。流动人口住房负担沉重，住房租金占收入比例高，自有住房比例低。



全球变暖或扩大社会不平等

邵博
2019-07-23 16:58 来源：澎湃新闻

气候变暖是我国面临的重要环境问题，其重要表现之一且更频繁、持续更久且更强烈的高温天气。7月初，我国华北、黄淮多地出现高温天气。6月底，欧洲也遭遇热浪袭击，多国高温打破历史纪录。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夏季的平均气温一直处于上升趋势（图1）。2018年，我国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天，中央气象台首次连发了33天的高温预警。全球变暖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对低收入群体影响更大。



“省管县”改革与地方财政监督问题

崔潇濛/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
2017-08-01 10:59 来源：澎湃新闻

“省管县”改革与地方财政监督问题

“省管县”改革与地方财政监督问题

“省管县”改革与地方财政监督问题



崔潇濛：用气象大数据支持农业发展

2019年04月16日 08:3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4月16日第1674期 作者：崔潇濛

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以下简称《文件》）在关于农业基础与农产品供给方面的讨论中提出“建设现代气象为农服务体系”。“气象为农服务体系”概念实际上在201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就已经提出了。与2016年相比，今年的《文件》在“气象为农服务体系”这个提法前又加了“现代”两个字。如何理解现代气象为农服务体系？“现代”这两个字在这里又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建设这样一个服务体系又需要开展哪些特殊的工作？



【澎湃】 公办还是民办？ 流动儿童义务教育阶段的挑战

作者：冯帅章（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教授）
韩昱洁（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



教育（网络图片）

摘要：作为城市未来发展的重要人力资源，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不仅涉及教育公平，还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和谐有序发展，以及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

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努力推进教育公平，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过去4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快速城镇化导致了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转移，同时也使大量农民工子女随父母迁移到城市。根据2010年六普数据估算，全国流动儿童总数已超过三千万。数量庞大的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不仅事关教育公平，也直接影响中国教育的整体水平。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出台了多项政策以确保流动儿童在流入地的受教育权。然而，尽管各地流动儿童受教育情况有所不同，流动儿童迄今仍

然面临不完全公平的教育环境。例如，北京市严控民工子弟学校规模，主要依赖公办学校招收流动儿童。上海市将郊区的民工子弟学校以政府委托办学的形式纳入民办学校监管体系，形成公办学校为主、民办学校为辅的流动儿童免费教育体系。而广州与深圳教育体系更为市场化，民办学校招收流动儿童比例与公办几乎平分秋色。总体来说，从全国范围来看，仍有相当比例流动儿童无法顺利进入当地公办学校，而只能入读专门招收流动儿童的民办学校。

因此，要改善流动儿童的教育现状，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坚实的经验基础，需要首先理解入读公办或民办学校对流动儿童在短期和长期的影响，以及影响的具体机制。

流动儿童义务教育阶段的民办学校

流动儿童教育问题主要是源于中国既有的户籍制度与人口流动现实之间的不协调。由于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的教育经费均由县（区）级政府进行分配，很难在不同区域间跟随人口进行转移。因此，流入地政府没有足够的动力为流动儿童提供公共教育服务，而没有本地户口的流动儿童也无法在流入地充分享受到法律所规定的免费义务教育。2001年，国务院首次提出“两为主”政策（即以流入地政府为主、以公办学校为主），2012年中央政府又发布了“两纳入”政策（即地方政府在教育计划和财政预算中纳入流动儿童）。各级地方政府也相应出台了文件措施，落实流动儿童接受公共教育服务的解决方案进一步加强。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的报告显示，入读公办学校的流动儿童比例由2008年的60%上升到2014年的79.5%。然而，仍有大约20%的流动儿童就读于民办民工子弟学校。

民工子弟学校对解决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其本身也面临种种问题。民工子弟学校是市场化的产物，起初是被企业家作为私营企业经营，其重要目的是追求盈利。这些学校主要通过收取学费来运营，而由于生源主要是无法进入公办学校的普通或劣势流动人口家庭子女，收费水平普遍较低。这就导致了民工子弟学校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都与公办学校差距很大。由于早期的民工子弟学校法律地位不清晰，经常被关停，学校举办者也缺乏进行长期投资的动力。

我们的研究通过在上海搜集的调查数据，探讨流动儿童入读民办小学是否会在短期对人力资本和升学，以及在长期对入读高中的影响。

民办学校教学质量更低

上海是流动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面临大量的流动儿童，上海市政府积极响应中央“两为主”政策，在2008年1月公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本市农民工同住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了“农民工同住子女义务教育三年行动计划”（以下简称“三年计划”）。“三年计划”要求在2010年底前关闭所有中心城区的民工子弟小学，这意味着居住在市中心的所有流动儿童都应当进入公办小学。另一方面，“三年计划”要求关停部分郊区的民工子弟小学，其他的全部都以政府委托办学的

形式纳入民办学校监管体系。因此，居住在上海市中心城区的流动儿童全部进入公办小学；而住在郊区的流动儿童部分进入公办小学，部分进入民办小学。

我们在之前的研究中，对上海市11所公办小学和9所民办小学的学生进行统一的数学和智力测试。结果发现，入读两类学校的流动儿童智力相当，但学校类型是影响流动儿童数学成绩的重要因素，民办学校的流动儿童数学考试成绩显著比公办学校的流动儿童低。这显示民办学校教学质量更低，入读民办小学对流动儿童的认知能力有负面影响。在随后的研究中，我们继续跟进这些流动儿童的情况，并且发现，随着上海市政府对民办学校的支持补贴力度加大以及监管力度加强，2012年的民办学校师资、学生成绩、家长反馈相较2010年都有较大提升。然而，根据学生成绩和家长的满意度反映，民办小学和公办小学之间教学质量仍有相当差距。

民办学校面临不公平制度壁垒

相对于幼升小，流动儿童小学毕业以后在上海继续升学的现状更为窘迫。我们的研究发现，小学毕业学校的类型是决定流动儿童能否进入上海本地初中的重要因素。对于流动儿童，民办小学的毕业生进入上海本地初中的概率显著低于公办学校的毕业生。这一差别与两类学校学生的考试成绩无关，完全是制度性的不平等导致。上海没有专门针对流动儿童的民办初中，而现有公办中学的学位不足，且优先录取对口公办小学的学生。因此，只有少量民办小学的学生在初中学位有剩余后才能进入上海的公办初中，而其余大部分需要返回原籍。返回老家的流动儿童要重新适应家乡的教材和新的学习环境，他们当中的许多孩子将从“流动儿童”转化为“留守儿童”。基于类似的原因，入读民办小学的流动儿童即使初中留在上海，也可能在初中阶段离开上海、返回老家。

入读民办学校除了在短期对流动儿童的认知和升学有影响，还有长期的影响，包括对流动儿童顺利升学高中的影响。



义务教育（网络图片）

义务教育阶段入读民办学校的长期影响

教育部近期公布的《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攻坚计划（2017—2020年）》提出，到2020年，全国普及高中阶段教育。这无疑凸现了高中教育的极端重要性。高中教育不仅是继续升学接受高等教育的必要步骤，并且本身也带来巨大的工资回报。根据2017年中国家庭就业调查（CHES）数据的显示，最高学历为高中水平的劳动力的年平均工资比最高学历仅为初中水平的劳动力的年平均工资高26%左右。国外学者的研究也显示，是否接受高中教育对于犯罪行为和死亡率等都有显著影响。

根据笔者和合作者在上海进行的长期跟踪调查，我们发现，调查样本中98%的上海本地儿童能连续升学进入高中，但仅有80%左右的上海流动儿童能顺利进入高中，他们当中大部分辍学，少部分留级念初中。在流动儿童中，小学阶段就读民办学校的，相比较于公办学校毕业生按时顺利入读高中的可能性更低，更有可能辍学或留级。一方面，民办小学的教学质量较差，导致学生成绩更低，而学习成绩无疑是进一步升学的重要决定因素。另一方面，入读公办小学的流动儿童更可能继续留在上海念初中，从而增加了他们进入职业高中的概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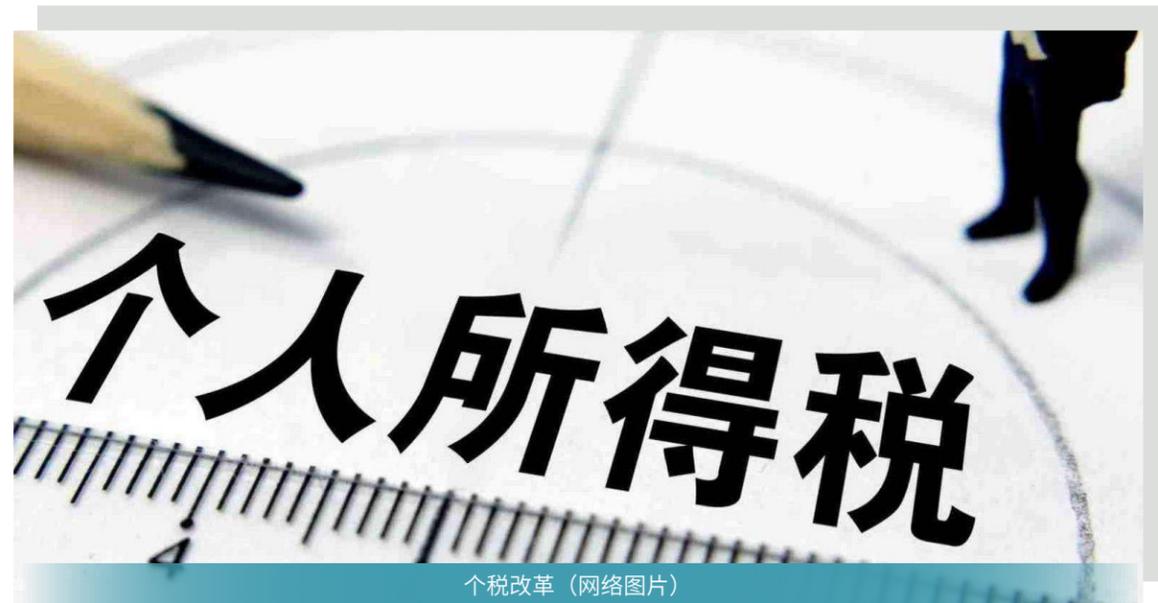
政策建议

是否进入公办小学对流动儿童的意义重大——不仅关系到流动儿童的成绩、是否继续留在上海念初中，还影响他们顺利进入高中学习的可能性。而这最终影响的是这些儿童在未来的工资水平高低，身体健康程度，是否犯罪等，乃至整个国家公民的教育素质。

作为城市未来发展的重要人力资源，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不仅涉及教育公平，还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和谐有序发展，以及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流入地政府应当为流动儿童提供更加平等的教育机会，加大公办学校向流动儿童开放的力度，包括优质公办学校。同时，民办学校作为一种过渡形式，在目前公办学校资源不能满足所有流动儿童的入学需求的情况下，仍有存在的必要。政府需要加大对民办学校扶持和监管的政策，并提升民办学校教学质量，破除公民办之间的制度壁垒。

【澎湃】中国个人所得税制的隐性区域不平等

作者：刘诗濛（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



个税改革（网络图片）

2018年8月3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第七次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与此前几次个税改革相比，新个税法改革力度大，涉及面广，切合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更好地保障了社会的公平性。个人所得税与每位公民息息相关，因此本次个税改革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热烈的讨论。本文依据新个人所得税法，讨论目前中国实行的全国统一的个人所得税制的隐性区域不平等，希望为关系国计民生的政策讨论贡献一份力量，为中国个人所得税制的后续改革提供新的思路。

本次个税改革主要内容

本次个税改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调整。

第一，收紧无住所居民个人判断标准。新个税法第一条明确引入了居民个人和非居民个人的概念。相比之前以无住所个人是否在中国境内居住满1年的判定标准，

新税法183天的标准大幅收紧了居民个人的时间判定标准。同时，新个税法也细分了居民个人和非居民个人的税收规定。

第二，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并优化税率结构。居民个人的四项劳动性所得合并为综合所得，并适用统一的超额累进税率，按月征税改为按年征税。同时，新个税法适当简并了应税所得分类，并适当调整了各档税率的级距。

第三，建立综合所得税前扣除机制，提高基本减除，增加专项附加扣除。个人综合所得扣除项目不再保留专门的附加减除费用，而是将基本减除费用标准提高到5000元/月。除此之外，还增加了赡养老人、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和租金六大专项附加扣除。

第四，引入纳税人识别号，完善自行申报与扣缴申报机制，并增加反避税条款。针对个人不按独立交易原则转让财产、在境外避税地避税等行为，赋予税务机关按合理方法进行纳税调整的权力。

可以看到，新的个税制度更加合理与优化。然而在这些调整中，除了专项扣除中的住房租金扣除按地区分为三档，其余条款都是全国统一。绝大部分人认为这种全国统一的税率税制，体现了公平性。然而在深入的经济思考下，事实并非如此。全国统一的税率税制恰恰会导致一种隐性的区域不平等。

统一税率的隐性区域不平等

在讨论个税制度的区域不平等之前，我们需要明白名义收入，真实收入与生活成本这几个概念与它们之间的关系。简单来说，名义收入就是公民所获得的所有账面收入的总和。假如一个人的收入只有工资性收入，那么这个人的名义收入即为他的工资。真实收入，则是名义收入的购买力或者能够购买的商品和服务。真实收入是剔除了各地生活成本与物价水平的差异之后的收入水平。

目前，中国的个税是按照名义收入确定税率与税额，并且是全国统一使用同一个税率结构。这种全国统一的税收制度，忽略了一个重要经济事实。那就是，在高收入地区，人们面临的生活成本往往也较高。例如，2017年，上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8988元（数据来源：2018中国统计年鉴），为全国最高；然而上海的生活成本指数为92（数据来源：《全球城市生活成本2017》调查），也为全国最高。因此，虽然上海的名义工资很高，但是由于同样很高的生活成本，与其它地区的生活水平差异可能并不如名义工资的差异那么大。在这种情况下，完全根据名义工资来确定税额存在着一种隐性的不公平。举个例子，A与B收入同为月工资1万元，A生活在上海B生活在重庆，两人应缴的个人所得税完全一样。然而由于生活成本的差异，B的生活水平远远高于A。两个生活水平完全不同的人却缴纳一样数额的个人所得税，这就造成了一种隐性的区域不平等。

事实上，这种隐性的区域不平等在世界各国都有一定程度的存在。例如，美国的联邦税也是依照全国统

一的累计超额税率对全美各州征收个人所得税。但是，经济学家真正意识到这一隐性的不平等现象并进行深入的研究却是最近几年的事情。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教授David Albouy在2009年的一篇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的文章中(The Unequal Geographic Burden of Federal Taxation)首次提出了美国联邦税的隐性地区不平等问题并量化了其造成的经济与福利损失。

该文章认为，美国实行的全国统一的联邦税降低了高生产力地区的长期就业率以及美国整体的生产效率，导致了社会总福利的损失。该文章阐述到，由于美国各城市的工资和生活成本差别较大，平均名义工资较高的城市，生活成本往往也较高。而美国的联邦税是依照名义工资计算税款的，平均名义工资高的地区在有着与其余地区相同真实工资的情况下，却要缴纳更多的税，并且没有享受到更高的福利。这会导致城市间税收分配不平等，使得大城市工资与房价相对下降，劳动力由此流向平均名义工资较低的城市甚至是农村，由此产生的就业地理分布效率低下，总体上降低了社会福利。事实上，在这种税收体系下，大城市的中产阶级在补贴小城市的中产阶级，而这并不是政府的初衷。依据一般均衡模型，该文章估算得出，这样的税收结构导致高工资地区的长期就业率降低了13%，土地和住房价格降低了21%和5%，整体损失的经济效率大约为每年280亿美元。

事实上，在美国的税收体制中，州税的存在以及各种基于当地生活成本的税收福利，例如按揭利息扣除，已经大大缓解了这一隐性的地区不公平。然而David Albouy在综合考虑了这些因素之后依然发现如此大的地区不平等和福利损失。而在中国的个税体系中，极少有这些基于当地生活成本的税收福利。在此次个税改革之后，也仅仅在住房租金专项扣除上考虑了地区差异。可以想象，在中国这种全国统一的个税体系下会造成更大的经济效率与福利损失。

事实上，在中国还有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那就是中国有大量没有当地户口的外来务工人员。大量的外地工人为城市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促使城市凭借人口红利不断发展。尤其是一线城市，外来务工人员是个十分庞大的数目。以上海为例，2016年上海常住人口为2419.7万人，而户籍人口仅有1450万人（数据来源：2017年上海统计年鉴）。而那些在高生活成本地区生活的外来



个税改革（网络图片）

务工人员，缴纳着比其他地区的外来务工人员更高的个人所得税，却无法享受与当地市民同样的社会保障福利，例如医疗保障、住房补贴、子女受教育机会等。这无疑会造成了更大的经济效率与社会福利的损失。

未来改革的方向

个人认为，本次中国个人所得税制改革的亮点无疑是增加了专项附加扣除，根据每个家庭的实际情况进行所得税的调整。并且，本次改革后，个人所得税制初步开始考虑区域差异，即按照区域生活成本的差异实行住房租金扣除。这些改革，体现了不同家庭纳税能力的差异，更是中国个人所得税制度逐步实现地区公平化的良好开端。

个人所得税为政府提供了稳定的财政收入，保障了优质的公共服务，并一定程度上通过财富再分配减少了社会不公平。然而正如本文所阐述，目前的个人所得税制存在着隐性的地区不平等，并带来了社会整体经济效率的损失。那么未来的改革方向，应该继续在保障公平和效率上努力。一方面，个税征收与扣除标准可以更多地放权于地方政府，使之能够针对当地实际情况，将各项专项扣除标准细化灵活化。在教育支出、医疗支出、老人赡养费用、按揭利息等各个方面实行区域差异化对待，

充分考虑当地的物价水平与长期发展方向，制定合理的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专项扣除标准，保障公平。另一方面，要兼顾公平与效率，充分考虑税收的宏观经济调控作用，加强基础设施与完整和谐法治法规的建设，促进可见的经济发展，关注中国各地区以及社会各阶层的协调发展，实现效率的最大化。同时，户籍制度的改革与个人所得税制的改革息息相关，涉及到千千万万外出务工人员的切身利益，政府在后续的改革中要做到高瞻远瞩，充分考虑不同政策之间的相互关联与影响，制定出最合理而有效的改革方案。

注：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本科生曹美连为本文进行了大量的资料搜集和前期工作。

【澎湃】中国流动人口住房负担调查

作者：张思思（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副院长、副教授）



住房问题（网络图片）

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流动人口从1982年的657万人增长到2018年的2.4亿人。他们当中的相当部分人，工作不固定，居住不固定，他们的居住是一件值得细看的大事。

本文使用暨南大学社会调查中心2017年中国乡城人口流动调查数据分析流动人口的住房现状。流动人口是指离开户籍所在地的县、市或者市辖区，以工作、生活为目的异地居住的群体。调查数据涵盖全国流动人口迁入和迁出人数最多的9个省份15个城市，包括广州、东莞、深圳、郑州、洛阳、合肥、蚌埠、重庆、上海、南京、无锡、杭州、宁波、武汉、成都，调查对象为过去12个月内累计在城市中居住达到3个月的农业户口外来务工人员，共计3817户。

根据调查数据统计，流动人口的住房来源中独立租赁住房占比为41.03%、单位宿舍占比为30.15%、自有房占比为15.20%、与人合租住房占比为10.11%、其他工作地点占比为1.96%、建筑工地占比为0.13%、其他住房来源为1.41%，具体结果见图1。

流动人口工作的不确定性决定了他们主要的居住形式是租赁，其中独立租赁是流动人口住房的主要来源，其次是居住在单位宿舍以及与人合租。由于大部分流动人口的经济收入不能负担高昂的购房费用，因此只有少数流动人口购买住房，流动人口在城市自有住房率仅为1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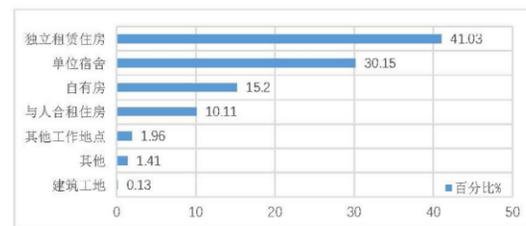


图1 流动人口住房来源统计

数据来源：暨南大学社会调查中心2017年中国乡城人口流动调查

发展水平不同的城市住房自有率的不同

对比分析不同城市流动人口住房来源发现：从住房自有率来看，蚌埠市、合肥市以及重庆市住房自有率较高，分别达到38%、34%以及28%；上海市、东莞市以及深圳市住房自有率较低，分别仅为4%、3%以及3%；从租房比例来看，杭州市、广州市以及无锡市租房比例较高，分别达到62%、60%以及58%，洛阳市、重庆市以及郑州市的租房比例较低分别为36%、38%以及45%；从其他住房来源如单位宿舍、建筑工地等来看，东莞市、宁波市以及洛阳市其他住房来源比例较高，分别为45%、42%以及42%，蚌埠市、合肥市以及成都市其他住房来源比例较低，分别为16%、19%以及23%，具体结果见图2。分析发现，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城市流动人口住房自有率更低，原因可能是其房价过高，流动人口购房压力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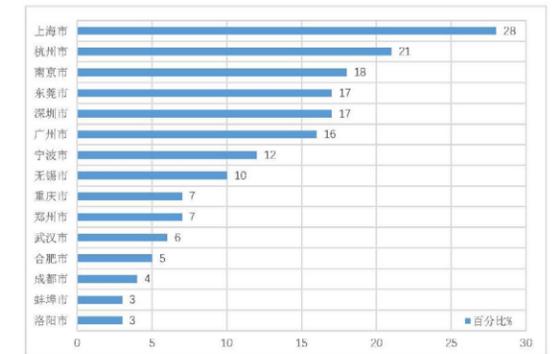


图3 分城市流动人口在老家拥有住房比例

数据来源：暨南大学社会调查中心2017年中国乡城人口流动调查

流动人口租用公租房比例低

从全国来看，流动人口租用公租房比例平均为7.1%，租用私房比例达到92.9%。对比分析不同城市流动人口租用公租房比例，东莞市、宁波市以及重庆市租用公租房比例最高，分别为15.56%、14.47%以及14.29%；合肥市、广州市以及上海市租用公租房比例最低，分别仅为0.97%、1.17%以及1.75%，具体结果见表1。不同城市对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申请公租房的准入标准不同。合肥市规定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除了需要劳动合同外，还需连续缴纳社会保险或住房公积金18个月（含）以上，同时与用人单位签署的劳务合同剩余期限需满1年。东莞市外来务工人员申请公租房条件为在本市工作及参加社会养老保险逐月缴费累计满5年；在本市用人单位工作并签订1年及以上劳动合同，该单位在本市为其缴纳社会保险、缴存住房公积金；申请人及其配偶在本市无自有住房；未享受过购买经济适用房、人才住房及房屋修缮等优惠政策。总体来看，公租房申请的准入条件对流动人口而言过于严苛，导致他们可选的租赁来源局限于地段偏远的城市居民私房以及失地农民的自建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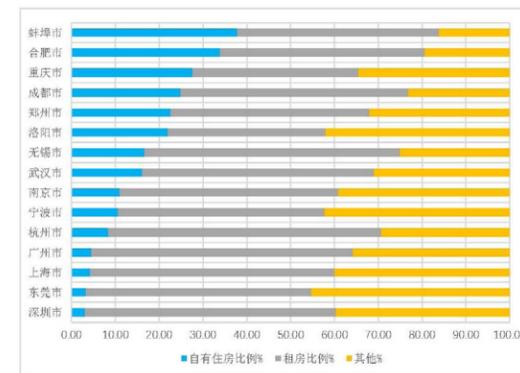


图2 分城市流动人口住房来源

数据来源：暨南大学社会调查中心2017年中国乡城人口流动调查

流动人口老家住房

对比分析不同城市流动人口在农村老家镇上（或县城）拥有住房比例，在发展水平更高的城市工作的流动人口在老家拥有住房比例更高，如上海市、杭州市以及南京市分别达到28%、21%以及18%，而洛阳市、蚌埠市以及成都市仅分别为3%、3%以及4%，具体结果见图3。由此，虽然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城市具有更高房价，使得流动人口在城市购买住房的能力下降，但是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也相对较高，使得他们在老家拥有住房的能力更强。

表 1 分城市流动人口租用公租房比例

城市	公房	私房	总计	租用公房比例
广州市	2	169	171	1.17%
东莞市	21	114	135	15.56%
深圳市	17	143	160	10.63%
郑州市	13	139	152	8.55%
洛阳市	8	87	95	8.42%
合肥市	1	102	103	0.97%
蚌埠市	3	56	59	5.08%
重庆市	11	66	77	14.29%
上海市	3	168	171	1.75%
南京市	5	159	164	3.05%
无锡市	5	65	70	7.14%
杭州市	17	182	199	8.54%
宁波市	11	65	76	14.47%
武汉市	8	141	149	5.37%
成都市	14	162	176	7.95%
全国	139	1818	1957	7.10%

城数据来源：暨南大学社会调查中心 2017 年中国乡城人口流动调查

武汉的住房满意度高

对流动人口的住房满意度进行调查发现，拥有自有住房家庭的住房满意度调查结果中“非常满意”占比 2.82%、“满意”占比 34.29%、“一般”占比为 50.79%；无自有住房家庭的住房满意度调查结果中“非常满意”占比为 1.09%、“满意”占比为 19.64%、“一般”占比为 52.47%，具体结果见图 4。其中，拥有自有房的家庭比没有自有房的家庭对住房“非常满意”和“满意”的比例分别高 1.73 个百分点和 14.75 个百分点。总体而言，拥有自有房的家庭较没有自有房的家庭住房满意度更高，也意味着提高流动人口自有房比例能够增强流动人口住房满意度以及生活幸福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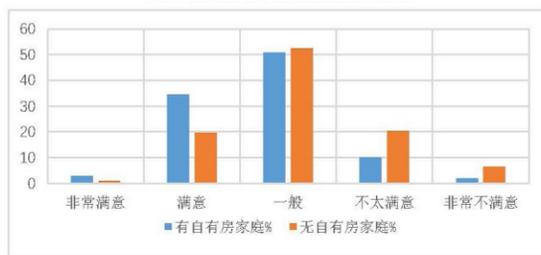


图 4 流动人口住房满意度对比

数据来源：暨南大学社会调查中心 2017 年中国乡城人口流动调查

比较不同城市住房满意度发现，武汉拥有自有房以及没有自有房的住房满意度均最高，分别为 60.47% 和 29.02%，蚌埠市拥有自有房的住房满意度最低为 19.15%，无锡市没有自有房的住房满意度最低为 15.00%。分析不同城市流动人口有无自有房家庭的住房满意度差别，无锡市有无住房家庭的住房满意度差别最大为 40%，其中有自有房的住房满意度为 55%、没有自有房的住房满意度为 15%；其次为深圳市和武汉市，有无住房的满意度差别分别为 31.45% 和 30.28%；广州市和上海市的住房满意度差别较小，分别为 5.92% 和 8.11%，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蚌埠市拥有自有房的家庭住房满意度低于没有自有房的家庭，相差 1.9 个百分点，具体结果见表 2。

表 2 分城市流动人口住房满意度

住房满意度分城市	住房满意度 (无房)	调查人数 (无房)	住房满意度 (有房)	调查人数 (有房)
广州市	17.15%	274	23.08%	13
东莞市	23.37%	261	33.33%	9
深圳市	25.27%	277	55.56%	9
郑州市	15.57%	244	30.43%	69
洛阳市	17.62%	193	26.42%	53
合肥市	16.78%	149	36.49%	74
蚌埠市	21.05%	76	19.15%	47
重庆市	27.03%	148	46.43%	56
上海市	19.16%	287	27.27%	11
南京市	26.04%	288	36.11%	36
无锡市	15.00%	100	55.00%	20
杭州市	18.06%	288	40.74%	27
宁波市	17.48%	143	41.18%	17
武汉市	29.02%	224	60.47%	43
成都市	17.93%	251	38.10%	64
全国	20.44%	3203	37.98%	568

数据来源：暨南大学社会调查中心 2017 年中国乡城人口流动调查

对比有自有房家庭以及无自有房家庭的人均居住面积发现，有自有房家庭人均居住面积为 29.88 平方米、中位数为 26.67 平方米；没有自有房家庭的人均居住面积为 16.07 平方米、中位数为 12 平方米，具体结果见图 5。从家庭住房面积分布来看，有自有房家庭中 39.11% 的家庭人均居住面积在 20~30 平方米、19.29% 的家庭人均居住面积在 10~20 平方米、18.75% 的家庭人均居住面积在 30~40 平方米；无自有房家庭中 36.85% 的家庭人均居住面积在 0~10 平方米、32.10% 的家庭人均居住面积在 10~20 平方米、16% 的家庭人均居住面积在 30~40 平方米。对比发现，有自有房家庭的与无自有房家庭在人均居住面积为 0~10 平方米的差异最大，前者只占 1.07%，后者高达 36.85%。此外，有自有房家庭人均居住面积在 20 平方米以上所占比例为 79.64%，无自有房家庭所占比例仅为 31.05%。因此，有自有房家庭的人均居住面积更宽敞，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拥有自有房价家庭的住房满意度更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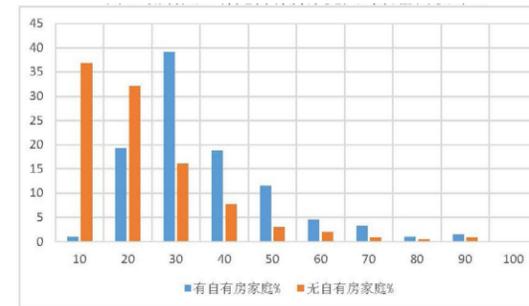


图 5 流动人口有无自有房家庭人均居住面积对比

数据来源：暨南大学社会调查中心 2017 年中国乡城人口流动调查

流动人口住房公积金以及住房补贴情况

住房公积金是指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所有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城镇私营企业及其他城镇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及其在职职工缴存的长期住房储金。调查结果显示 85.84% 的流动人口没有住房公积金，仅有 13.73% 的流动人口通过单位负担、自己购买、单位与自己共付以及其他方式拥有住房公积金，具体结果见图 6。因此，目前我国流动人口住房公积金覆盖率还处于较低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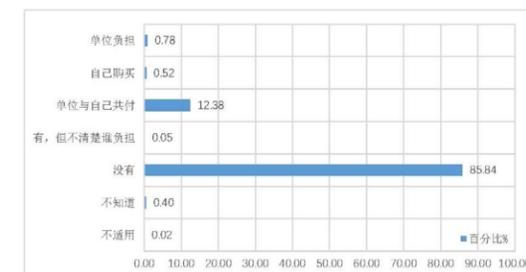


图 6 流动人口住房公积金

数据来源：暨南大学社会调查中心 2017 年中国乡城人口流动调查

分析单位对流动人口住宿以及补贴情况发现，提供住宿并且住在宿舍的流动人口比例为 43.23%，不提供住宿也没有补贴的比例为 34.27%，提供宿舍但不住、没有补贴的比例为 17.64%。值得注意的是，单位提供住宿补贴的比例非常低仅为 4.43%，具体结果见表 3。

表 3 流动人口单位提供住宿以及补贴情况

单位提供住宿补贴	频率	比例
提供住宿并且住在宿舍	1201	43.23%
不提供住宿，但住宿费有补贴	77	2.77%
不提供住宿，也没有补贴	952	34.27%
提供住宿但不住，有补贴	46	1.66%
提供住宿但不住，无补贴	485	17.46%
其他	17	0.61%

数据来源：暨南大学社会调查中心 2017 年中国乡城人口流动调查

流动人口住房负担重

全国流动人口房租收入比的均值为 16.53%，其中深圳市、郑州市、合肥市、重庆市、上海市、杭州市、武汉市以及成都市房租收入比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郑州市房租收入最高为 24.64%。对比发现东莞市房租收入比最低为 7.67%，同时联系上文发现东莞市流动人口公租房比例最高为 15.56%。全国流动人口房租收入比的中位数为 12.92%，郑州市流动人口房租收入比中位数最高为 22.39%，东莞市流动人口房租收入比中位数最低为 5.77%。

全国房租支出占收入比例的分布见图 7，可知 33.30% 的家庭房租支出占收入的比例在 0~10% 之间，37.31% 的家庭房租支出占收入比例在 10%~20% 之间，16.05% 的家庭房租支出占收入比例在 20%~30% 之间，家庭房租支出占收入比例在 30% 以上的家庭合计占比为 13.34%。由此，流动人口房租支出占收入比例主要集中在 0~20% 之间，降低流动人口房租支出有助于有效提高其可支配收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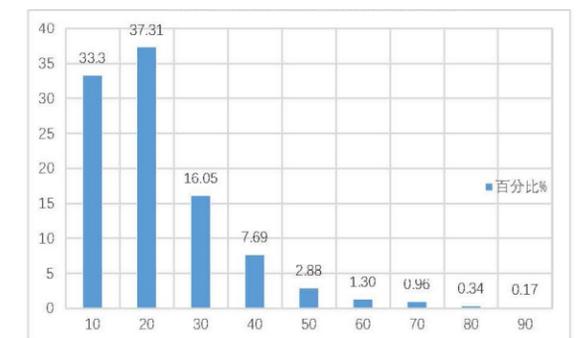


图 7 流动人口房租支出占收入比例

数据来源：暨南大学社会调查中心 2017 年中国乡城人口流动调查

全国自有房月供比的均值为 27.47%，其中东莞市、郑州市、蚌埠市、重庆市、南京市、无锡市、武汉市自有房月供比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蚌埠市自有房月供比最高为 36.1%。对比发现深圳市自有房月供比最低为 8.15%，说明在深圳工作的流动人口每月偿还购房压力相对最小。全国流动人口房租收入比的中位数为 25.45%，蚌埠市流动人口自有房月供比中位数最高为 40%，深圳市流动人口房租收入比中位数最低为 8.15%。

全国流动人口月供支出占收入比例的分布见图 8，可知 9.68% 的家庭月供支出占收入的比例在 0~10% 之间，28.11% 的家庭月供支出占收入比例在 10%~20% 之间，22.12% 的家庭月供支出占收入比例在 20%~30% 之间，18.43% 的家庭月供支出占收入比例在 30%~40% 之间，家庭月供支出占收入比例在 40% 以上的家庭共有 21.66%。由此，目前流动人口家庭月供支出占收入比例还处于较高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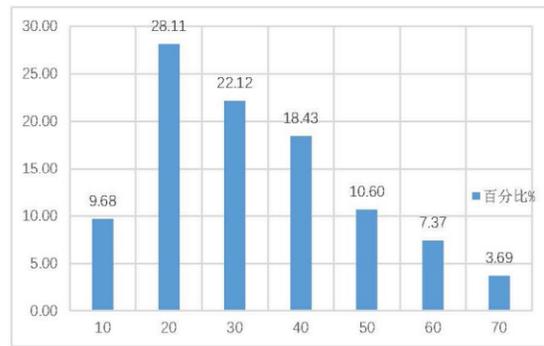


图 8：流动人口月供支出占收入比例

数据来源：暨南大学社会调查中心 2017 年中国乡村人口流动调查

总结与建议

总而言之，流动人口目前在城市主要住房来源为租房，自有房率低。比较不同城市流动人口自有房率发现，流动人口在发展水平越高的城市自有房率越低，随之在老家拥有住房的比例越高。比较有自有房的流动人口满意度发现，拥有自有房的家庭具更好的住房满意度，同时人均住房面积跟宽敞。从住房公积金覆盖率来看，目前绝大部分流动人口没有住房公积金，同时单位提供住宿补贴比例低。从流动人口住房负担来看，房租支出占收入的比例以及月供支出占收入的比例均在较高水平，流动人口住房负担较重。

为使流动人口更有尊严地在城市生活，促进流动人口更好地融入社会，提高其住房满意度以及生活质量迫在眉睫。主要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改进，其一是提高流动人口的经济收入以提高其支付能力，其二是进一步完善规划住房租赁市场提高流动人口住房来源，最后是推进公积金制度改革减轻农民工购房压力。

(一) 提高农民工支付能力

a) 提高流动人口就业能力

流动人口的文化水平、劳动技能以及综合素质普遍处于较低水平，截至 2017 年底，我国 2.86 亿农民工中 67.1% 没有参加过任何技能培训，有 73.6% 未接受过高中以上教育。因此，大部分流动人口只能从事技术含量较低的职业，同时工作时长、工资水平低。较低的工资水平直接降低流动人口住房支付能力，使其生活水平下降。提高外来流动人口的就业能力，不仅可以提高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同时能够促进我国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一方面政府部门可以与培训学校合作，针对不同城市经济发展的技能以及岗位要求，有针对性地对流动人口进行专项培训。此外，政府部门可以进一步落实和完善外来流动人口职业技能培训的补贴工作，通过免费或者缴纳少量费用的方式对流动人口进行培训，鼓励外来流动人口不断提高其专业技能。另一方面，政府可以其他方式鼓励企业对流动人口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如流动人口职业培训费用允许企业进行税收专项扣除等。

b) 为流动人口提供更多的就业信息

流动人口由于文化水平较低以及社会融入度不高，使得他们获取就业信息的渠道较少，市场就业信息传导不畅通直接导致其可选职业受限，在劳动力就业市场上处于劣势地位。政府部门可以通过在就业网站发布就业信息，在流动人口聚集较多的街道以及居委会发布线下就业信息，定期组织面向流动人口的专项招聘会，促进流动人口获取就业信息，缩短流动人口搜寻工作机会的时间，提高劳动力与岗位的匹配效率。

(二) 进一步完善规范住房租赁市场

诚然，绝大部分流动人口拥有住房也是不现实的。有些流动人口工作不稳定，在城里购房并不是最好的选择。所以进一步完善公租房保障制度，丰富公共租赁住房类型，有效激活民间房屋租赁市场，建立公租房信息动态监测系统以及政策实施的监管机构也非常重要。

完善公租房保障制度的主要方式是：1、构建更加合理的货币补贴公租房租金体系，如根据不同群体的收入水平以及居住成本，对不同群体制定不同的住房补贴标准。2、依据不同出租人的经济承受能力以及家庭情况，提供多层次公租房类型供流动人口选择，如对最低收入的农民工群体提供廉租房，对中低收入群体提供社会化公寓以及经济住房，鼓励中等及以上收入的农民工群体购买与其经济能力相适应的自有房，同时提供一定优惠与补贴。总之，通过上述方式，政府一方面能拓展流动人口房屋租赁的来源，利用已有住房资源改善流动人口居住条件，另一方面又可通过激活民间房屋租赁市场来盘活房屋存量。借鉴发达国家解决流动人口住房的经验，我们可以看到，通过建立关于保障性住房以及租房租赁市场的强有力监督和管理机构，有助于统筹规划不同地区住房政策、有效跟进住房政策的执行情况，并保障住房政策的有效实施。

(三) 推进公积金制度改革

根据流动人口的特点建立推进公积金制度改革，如降低公积金支付房租门槛，全面推进公积金异地购房制度。首先，针对流动人口群体收入水平普遍较低的特点，建议降低提供公积金支付房租的门槛，同时为公积金冲抵公租房租金提供更加便利的渠道。其次，针对流动人口流动性大的特点，建立全国住房公积金管理系统，在农民工与企业解决劳动关系后可以办理住房公积金的异地存取，减轻农民工购房压力。此外，针对农民工与企业在公积金谈判中谈判能力的不对等情况，通过提高企业违反公积金强制缴纳规定的惩罚力度，如采取停业整顿以及冻结资金等方式，促使企业及时缴纳公积金。

【财新网】女性公平就业难，职场离性别真正平等还有多远

作者：杨哲（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妇联界委员联名提案，应当出台促进女性公平就业激励政策，女性就业影响国家人口发展战略，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峻挑战。早在 2 月 21 日，人社部教育部等九部门印发通知，要求各类用人单位在拟定招聘计划、发布招聘信息、招聘人员过程中，不得询问妇女婚育情况，不得将妊娠测试作为入职体检项目，不得将限制生育作为录用条件。目的是为了禁止招聘过程中的性别歧视，促进妇女平等就业。这一规定的出台，立刻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热烈的讨论。不少人担心，这些规定不仅不能给女性带来真正的职场优惠，反而会对进一步减少女性的就业机会。用人单位了解女性求职者婚育情况的动机是什么？招聘不得询问女性婚育究竟会产生哪些效果？男女职场平等的真正障碍是什么？如何从根本上促进男女职场平等？本文根据我国妇女的家庭和就业的实际情况，并应用国际前沿的劳动经济学和家庭经济学理论，就上述问题进行了详细分析。

一、用人单位在招聘过程中了解女性婚育情况的动机

在市场经济中，企业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盈利，需要以尽可能低的成本招到绩效尽可能高的员工。绝大多数情况下，女性在产假期间不能为企业创造绩效。同时，产后的育儿任务也会使女性业绩受限。所以企业在招聘时要判断一名女性的未来业绩，就会考虑其近期的生育概率。尤其是在行业竞争激烈、员工流动性高的小企业，如果遇到几例入职不久就怀孕、休完产假就离职的情况，将对企业造成不小的冲击。因此这类企业在招人的过程中，避开已婚但尚未生育的女性是一种理性选择。反过来，在流动性低、不以盈利为导向，或者所处行业以公有制为主导、市场竞争不激烈的单位，女性生育期间绩效受限的问题相对来说不那么重要。因此这类企业在招聘时了解女性婚育情况的动机相对来说较弱。



女性求职者（网络图片）

三、男女职场不平等的根源

经济学界对男女工资、就业不平等的解释有很多种，大体可以归结为三类：人力资本、制度观念以及由女性生养后代方面的禀赋导致的家庭内部按比较优势分工。

首先，在体力劳动占主导的年代，男性人力资本通常高于女性。无论是在农业社会，还是工业化的早期，大部分工作对体力都有较高的要求。在这些社会阶段，男性相对于女性具有先天的经济优势。借助长期的经济优势，男性主导了上层社会，造成女性通过自身技能提升社会地位的回报率很低，形成了在后天人力资本投入方面重男轻女的局面。这些投入不仅包括营养、识字、上学，还包括在竞争意识、风险偏好等个性的形成，工作经验的获取、人际网络的建立等方面。今天随着技术的进步，脑力劳动和人际沟通慢慢取代体力劳动，男性的先天优势在逐渐弱化。同时，女性人力资本投入的回报率，包括通过找工作和找对象两个方面，都随着选择面的拓宽而上升。再加上在校学习期间女孩相比于男孩有非认知能力方面的优势，男女教育程度差异正在逐渐缩小，甚至在一些发达国家已经逆转。考虑到上述因素，个人认为男女在人力资本上的不平等，无论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都正在随着技术进步不断缩小，朝着良性循环的方向发展。

其次，制度和观念也是造成男女就业不平等的因素之一。制度方面，Goldin 和 Rouse 于 2000 年在他们发表于 AER 的研究中发现，在乐团选拔过程中如果用幕布将演奏者和裁判隔开，不让双方互相看到对方的性别，这一制度使得女选手入围的成功率提高 50%。性别观念方面，Bertrand, Kamenica, Pan 于 2015 年发表于 QJE 上的一篇研究使用美国人口普查 1970-2000 年的数据显示，夫妻收入比的分布在 1:1 处存在跳跃。为了避免出现在收入上出现“阴盛阳衰”这一不符合传统观念的情况，当妻子的潜在收入大于丈夫的潜在收入时，妻子会刻意让自己的实际收入低于潜在收入。尽管如此，无论是最近的美国人口普查数据还是国内的 CFPS 数据都显示，“男主内，女主外”的比例在逐年攀升。个人认为，这个趋势印证了性别观念作为上层建筑，会自然跟随经济基础的方向变化。一旦有了男女平等的经济基础，观念的转变将会水到渠成。因此性别观念的滞后并非解决男女平等问题的难点。

最后是生育问题以及男女双方按照各自比较优势的分工。即使男女在职场上的能力完全相同，但由于女方更能胜任照顾小孩（更不用说生产小孩的能力），为了提高家庭合作的效率，女方会承担更多照顾小孩的任务，减少在职场上投入的精力。雇主出于对这一原理的认知，会默认即使男女双方在相同的岗位工作，工作时间相同，男方比女方在工作上也更卖力。例如遇到小孩生病的时候，女方比男方更容易从工作中分心。这种男女角色分工是由生理差异决定的，无法通过技术进步和政策抹平，是最难解决的男女不公平。

四、未来促进男女职场平等的一点建议

个人认为，现阶段解决男女职场不平等的问题，关键在于减少企业雇佣女职工的风险。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让企业愿意招聘女员工的最有效办法就是通过政府提供保障，让企业雇佣女性变得有利可图，或者至少不成为负担，不亏钱。相比于招男性，企业招女性最担心什么？入职休产假，生完孩子就离职。只有帮企业抹平这种风险，才能消除招聘女性的顾虑。具体有两种思路：第一种是在事前减轻风险。例如美国，要求 50 人以上的企业为入职一年以上的员工提供三个月的产假，但在国家层面不对带薪产假做任何要求。尽管各州有额外的关于产假长度和薪水的规定，有的大公司甚至还提供更诱人的带薪产假福利来吸引人才，但总体来看，在长度上比我国现行的产假要短，产假期间相对工资标准比我们要低，且设有少量的工龄门槛。相比于薪水，我国企业更难承受的产假成本是缺岗和入职不久就请产假。尤其是对很多重要的岗位，半年空缺显得过长。针对这两点，个人建议可以把产假时间设置得更灵活些，减少全休的时间，增加半休的时间。总长度还可以和工龄相关：刚入职的给短点，入职久的奖励长点，以求在总体产假福利变化不大的情况下，减少企业的风险和负担。第二种思路是在事后适当补偿企业的损失，例如给休产假的女员工所在企业减税。总之，只有让女性的生育不再成为企业的包袱，企业才会放心去招女职工，男女职场平等才能真正实现。

二、强制规定用人单位不准在招聘过程中了解女性婚育情况的可能效果

不同类型的单位，强制规定不准了解女性婚育情况的效果会有很大差别。在国家机关单位，招聘时避开育龄已婚无孩女性的动机相对较弱，因此规定带来的额外限制并不大，预计将会相对顺利地带头执行规定。而在大多数私营小企业，基于降低成本、利润最大化考虑，会在招聘时想尽一切办法，以明面上不违反规定的间接方式了解女求职者的婚育情况。同时，即使企业不主动打探，女性求职者出于对企业需求的认知，会争相主动展示自己在婚育情况方面相对于其他人的优势。无论哪种情况，企业都会得知求职者的婚育状况。因此，即使是在原本对已婚未育女性不友好的企业中，强制规定的预计效果也不大。

以上分析都基于“实际上企业总有办法绕开规定”的假设。要是把绕开的路都完美地堵上，彻底断绝企业获得女求职者婚育状况信息的渠道，会有什么后果呢？经济学理论认为，在企业完全无法区分婚育状态，只能“盲招”的情况下，会把各种婚育情况的预测绩效混合在一起开出平均待遇。这样的结果是，原本有机会展示“有竞争力”的婚育状况的职场女性将因此而受到统计性歧视。对她们来说，这个新的“大锅饭”不如原本能争取到的待遇，她们当中的一部分因此会退出。然而，

退出的这部分人恰恰是企业最想要的人，导致剩下的女性求职者中能给企业带来风险的已婚育龄无孩的女性比例增加，从而进一步压低企业对女性的混合预测绩效以及平均待遇。由此将形成一个对企业来说劣币驱逐良币的过程。当企业给女性的待遇降到比男性低很多，且引起争议而没法继续降低时，就会干脆不招聘女性。最后形成一个对职场女性更加糟糕的局面。

类似的以公平就业为目的而设计的规定产生适得其反效果的例子在美国曾有过先例。Jennifer L. Doleac 和 Benjamin Hansen 在 2016 年发表于 NBER 的工作论文使用 CPS 数据在实证上提供了参考。这篇研究的对象是美国最近二十年来在各州陆续推行的一项致力于促进有犯罪前科的人重新就业的法案。这项法案规定企业在招聘过程中不得询问犯罪记录，以求在职场上给改过自新的前服刑人员一条活路。但是研究结果显示，这项法案给全体没上过大学的年轻黑人找工作造成了障碍，导致这些人的平均就业比例降低了 3.4 个百分点。研究还发现，很多雇主努力通过其它方式搜索到了求职者以前的服刑情况，还有很多雇主干脆就不雇佣黑人了，给守法的黑人带来严重的统计性歧视。犯罪记录和婚育状况固然有着天壤之别，但二者在劳动力市场上引起的由信息不对称到统计性歧视的机制是相通的。

【财新网】贸易战升级： 中国产能会转移到东南亚吗？

作者：殷立娟（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



制造业企业（网络图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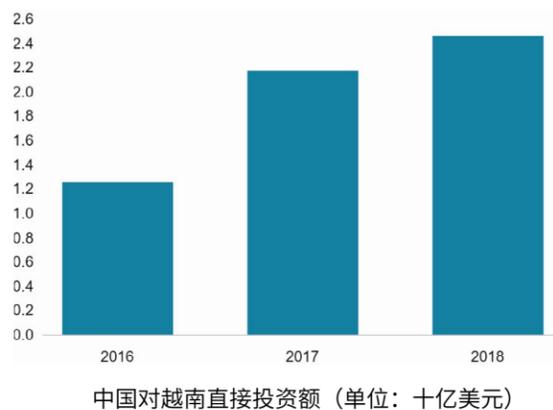
虽然迁移潮早已开始，但东南亚还没准备好，短期难以取代中国。如果将在中国的产能搬迁到东南亚国家，企业将不得不面对巨大障碍。

从去年1月美国对进口太阳能电池板和洗衣机加征关税开始，到今年5月10日美国提升对中国2000亿美元商品的关税水平，特朗普一共挑起了七轮关税冲突。中国企业以及在华外资企业向美国出口的商品将面临巨额关税。在中国设厂的制造商是否会寻求将生产线转移到不受加征关税影响的国家，比如越南、印度尼西亚等临近的东南亚国家？

迁移潮早已开始

随着近年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并出台日益严格的环保法规，国内许多工厂早已面对人工、成本上涨的问题。贸易战成为了一个触发点，促使它们尽早把生产线迁移，而中国亦有意把经济向高科技生产、服务及消费方向转移。

以越南为例，早在去年9月美国实施第一轮制裁之前，包括中国公司在内的外国企业就已在越南布局，目的就是利用越南的廉价劳动力和有利的商业环境。对越南投资的增加，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工资水平持续上涨，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2019年前四个月，中国对越南投资已达到2018年全年投资额的65%。



中国对越南直接投资额（单位：十亿美元）

尽管行业发展需要一个长期过程，越来越多证据显示，美国对中国商品日益严苛的关税制裁在进一步推动对越南的投资。

东南亚准备好了吗？

美中已互相加征了新一轮关税，进一步提高了在华企业尤其是跨国企业的成本。但事实上，如果将在中国的产能搬迁到东南亚国家，企业将不得不面对东南亚国家的现状所带来的巨大障碍。

第一，东南亚物流基础设施落后。

过去十年一些企业为了降低劳动力成本已经将部分工厂搬迁到东南亚国家，但该地区的基础设施却不尽如人意。越南、泰国、菲律宾、柬埔寨及其他东南亚国家普遍存在公路网铺设不足、铁路班次有限和港口拥挤的问题，这些落后的物流设施拉长了交货时间，进而推高了运输成本。

以越南为例，贸易的日益增长让越南的基础设施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作为东南亚至美国海上贸易路线的最后一个装货港，在2008年至2017年期间，越南港口的集装箱吞吐量从440万标准箱大幅增至1230万标准箱，但由于缺少深水港口设施，通常需要中小型货柜船在缅甸、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和柬埔寨等国家转货，再到达越南港口，之后再横跨太平洋到美国西海岸。这就意味着越南出口商常常需要竞争稀缺的舱位。

物流堵塞导致交货周期延长，海上库存存在逐步增加。随着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寻求转移生产到东南亚等国，东南亚的物流设施预计很快会到达瓶颈。相反，中国拥有成熟有效的物流渠道和物流设施，紧密高效地把工厂、供应商和全球客户联系在了一起。据世界银行2017年基建素质评级，泰国及越南分别排行41与47，中国排行20。因此，中国的制造业短期难以被取代。

第二，东南亚国家劳动力效率和规模有限。

纵观整个东南亚的经济规模和人口规模，中国的市场规模无法被取代。2017年中国总人口为13.8亿，GDP为12.25万亿美元，人均GDP为8827美元。东南亚10国总人口为6.01亿，GDP为2.78万亿美元，人均GDP为4625美元。东南亚固然有新加坡、文莱这样的发达国

家，但都是小国，市场规模有限，而印尼、缅甸、越南等大国都是低收入国家。至少在目前，把东南亚和中国相提并论是不恰当的，中国的市场规模是东南亚的4倍有余。

许多公司在贸易战之前，已经在中国海外尤其是东南亚地区投资生产，然而制造业的快速增长已经给这些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带来了压力。再以越南为例，制造业的快速增长导致熟练技工的短缺，因为现有的公司已经把越南本土的技术熟练工人挑走了，这导致越南劳动力成本正在上升。长期来看，越南年轻劳动力的数量也远比不上中国。2018年越南工业就业人口刚超过1450万人。相比之下，据广东省统计局统计，仅广东省就有1271万制造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58%。同时，广东持续大量地吸收了流动人口。越南不可能成为下一个中国，甚至很难成为下一个广东。

第三，东南亚国家缺乏中国的规模经济。

中国经济庞大的人口和经济规模，决定了中国企业生产产品的多样化和规模化。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已经产生了一般国家所无法比拟的大生产区域的集聚效应。所谓“集聚效应”即经济学中所说的规模经济，一方面，人口的大规模聚集促进了城市的经济发展，使得市场扩大，也更加多样化，生产的专业化程度得到提高；另一方面，大经济体由于其庞大的人口基数，使得基础设施、社会保障方面的边际成本相比于规模较小的经济体更低，所以人口密集的大经济体的人均基础设施投入更低。规模经济的优势是东南亚各国目前无法媲美的。比如阿里巴巴这样的在线搜索引擎，绝大多数都是由中国供应商主导的，在阿里巴巴（Alibaba）上搜索“塑料袋”供应商，搜索结果显示潜在越南制造商仅为485家，而在中国搜索出的供应商高达3850家。

“越南制造”“印尼制造”的标签 一定可以躲避美国关税吗？

对于为了躲避关税而将全部或部分供应链从中国转移到东南亚的公司而言，美国一样有可能对这些国家采取制裁行动。事实上，东南亚国家被制裁的风险确实在增加。一些跨国公司采取“中国+1”的方式——公司在中国保持生产，同时也在亚洲其他一个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地区生产运营。美国政府意识到，将生产运营向海外转移是中国企业规避制裁的一种方式。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发表推文称，“许多被征税的公司将离开中国转移到越

南等其他亚洲国家。因此中国才如此急于达成协议。”在中美不断升级的贸易战中，“越南制造”这样的标签可能不足以让制造商躲避美国关税。如果只有一个国家面临惩罚性关税，企业还可以找到方法减轻它对自身利润和消费者的伤害。但如果美国同时提高对世界很多地区的关税，那么企业策略就没有多少回旋余地了。

我们的研究（Global value chain and destructive creation）预计，低技术含量及低价值生产公司会更快迁移，但高附加值出口产品，例如资讯科技、交通运输等，短期内限于东南亚国家的设施和技术水平不足，则需要更多时间完成。因此中国核心的制造业模式不会被完全取代。比如中国精通的汽车制造业，其他国家难以完全取代中国，更多的是寻找“中国+1”、“中国+2”、“中国+3”的模式，这样的模式只是把生产线多元化，而非完全放弃把生产核心放在中国。

同时，为了保持中国制造业核心优势，最重要的是加强市场主导作用，提高生产效率和改善营商环境，促进企业创新。首先要进一步加强生产要素的流动。市场仍然是配置生产要素最有效率的手段，目前中国虽然在商品流通方面基本实现了市场经济，但是生产要素如土地、劳动力、资本等的市场化流通仍然阻碍重重，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仍然面临户籍制度的限制，农民的土地使用权仍旧无法成为农民的资产，从而实现自由流通，同时国家金融体系管控下的金融资本市场仍然存在严重的扭曲。其次要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和法治化营商环境，促进正向激励和优胜劣汰，发展更多优质企业，培养高效公平的营商环境，提高对优质企业的吸引力。

【澎湃】转基因正在敲门，中国要避免被动接受

作者：崔潇濛（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

从孟德尔通过豌豆实验发现遗传定律，到袁隆平通过杂交水稻让全国人民“吃饱饭”，人类在超过千年的历程里不断尝试着用各种方法来改变植物的基因组合，以得到满足人类需要的作物特征。以杂交育种为代表的传统育种方式需要靠大量的“试错”来找到令人满意的结果，而许多人类求之不得的作物性状只在漫长岁月等待后的自然基因突变中才悄然出现。长久以来，人类为了提高这一选育过程的效率而作出了大量的努力。转基因的出现则为人类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世界为什么需要转基因？

1980年以来生物技术的飞速发展为世界带来了基因工程（genetic engineering）所涉及的一系列技术，而这些技术现在则被人们泛泛地称为“转基因”。通俗地讲，转基因技术可以将一个具有特定功能的基因片段从一个生物体中定向转移到另一个生物体中。在农业应用中，相比传统育种，转基因技术这种“定向”的操作方式大大加快了对特定优良性状的选育过程，并降低了传

统杂交过程中巨大的不确定性。同时，转基因可以使得一些以杂交方式无法实现的基因组合变为现实，为优良性状育种创造了更大的空间。

在全球范围内，目前已产业化的转基因作物主要的特性是抗虫害和对特定农药免疫。这两类转基因作物特性是对农民需求的直接回应。在许多大宗作物的生产过程中，防治虫害和除草等环节都需要农民做出大量的资源和时间投入。这两类特性的出现大大降低了农民的生产和管理成本。我国在20年前开始推广转基因抗虫棉也是对当时棉铃虫大爆发并造成“棉荒”的一种回应。我国目前转基因棉种植面积逾300万公顷。除棉花外，我国唯一的另一个产业化转基因农产品是番木瓜，但相较于棉花，其种植面积几乎可以忽略不记。

转基因作物的另一大“卖点”是增产，但国内外对此一直存在诸多争论。《纽约时报》在2016年的一篇专题文章曾通过对美国和西欧玉米单产变化趋势的简单对比“证明”转基因玉米不会增产。就此，笔者在与著



转基因农作物（网络图片）

名农业经济学家 Colin Carter 共同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对这一“证据”进行了批驳，并指出一个科学的对比必须基于对气候、政策等诸多其他因素的控制之上。在去年发表的一篇学术文章中，普渡大学和堪萨斯州立大学的研究者利用现代计量方法，在控制了诸多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发现，美国转基因玉米的采用对玉米单产的提升达17%。这种增产效应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虫害减少和生产环节效率提升。

目前，全球范围内转基因采用率最高的作物是棉花、大豆、玉米、菜籽。其中，转基因棉花产品几乎不会出现在食品行业。转基因大豆、玉米、菜籽则主要以加工制成品、动物饲料等形式支撑着整个食品工业的运转。此外，很大比例的转基因作物并不会直接进入食品工业，而是以各种形式进入能源（如生物燃料）、化工（如玉米化工醇）等其他领域。由于转基因玉米、大豆的特性不是提高口感或营养，他们在生鲜农产品市场上并不具备任何竞争力，也因此不会作为生鲜农产品直接用于食物消费。

从世界农业发展的角度来讲，转基因作物的普及和推广将是一种必然。一方面，人口增长本身及新兴国家的经济发展意味着全球的食物消费需求会在未来持续上升。世界银行在2017年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全球的食物消费需求在未来15年内将至少增加20%。另一方面，耕地资源愈发紧张，食物供给的压力将主要通过提高单位面积的产出来得到缓解。然而，基于著名农业经济学家 Julian Alston 等人的研究发现，传统育种在增加单产上的边际贡献已经变得非常微小。若干年后，转基因对

人类而言可能将是“生与死”的选择。

中国的转基因产业化或成被动选择

在食物需求和供给间的矛盾这件事上，中国是世界的缩影。在需求端，我们看到的是粮食需求量持续上涨；在供给端，我们看到的是对18亿亩红线严防死守。在粮食自给的方针下，供需间的矛盾似乎越发难以调和。一直以来，国家层面显然对转基因等生物技术的发展十分重视。我国转基因技术的研发在20世纪80年代便开始起步，如今大面积推广的转基因棉便由我国自主开发并拥有知识产权。

我国针对主粮作物转基因的自主研发也已超过20年，但严重的舆情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研发和应用转化的进程。在“反转”声势最浩大的一段时间里，甚至出现过多起人为破坏转基因实验田的事件。目前，我国转基因发展的方针被总结为16个字：“确保安全、自主创新、大胆研究、慎重推广”。在此方针下，转基因研发持续推进，但转基因产业化尚无任何时间表。

然而，危机已经迫在眉睫了。与发展方针的美好构想相对的，是现实中越发不可控的转基因“入侵”。近年来，各地每年都有多起非法生产、加工转基因玉米的案件受到通报。一些非官方统计显示，在我国种植的玉米当中，已有很大比例的种子携带了转基因玉米种子的基因信息。

多年来，转基因玉米种子通过多种途径流入我国境内。虽然执法部门对非法贩卖转基因种子的处罚力度并不轻，但转基因玉米非法偷种的现象并未得到有效遏止。转基因种子黑市在近年来迅速发展，在通过各种途径流通的玉米种子中，具有抗虫特性的玉米种子最受农民的青睞，而业内人士指出这些抗虫特性大多来源于国外的转基因玉米种子。对农民而言，是否使用有抗虫特性的玉米种子对其最终的销售利润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我国目前转基因玉米泛滥的问题已十分严重，许多种植转基因玉米的农民甚至并不清楚他们种植了转基因玉米。然而，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可能带来“基因飘散”，使某些特定的基因信息被附近的其他作物所携带，并进而产生负面的环境影响。国外合法种植的转基因作物需要按管理规定在附近设置生物隔离带以防止“基因飘散”的发生，但我国非法种植的转基因作物并不会采取此类针对性的措施。这将使非法转基因玉米产生的“基因飘散”问题更为严重，进而使得更多“无辜”的玉米携带了“非法”的基因。玉米产业严峻的形势可能会迫使国家提前转基因玉米的产业化。在这一背景下，充分评估放开转基因玉米的潜在影响将是短期内十分重要的工作。

中国的优势与挑战

转基因作物种子的研发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源与时间，这一点与很多新药物的开发十分相似。在一个完全商业化的环境中，这类研发的实现通常依赖于具有垄断性质的企业。企业对垄断利润的追求构成其前期研发投资的激励。然而，种企的垄断能力可能会使农民的利益受损。目前已被拜耳收购的孟山都（Monsanto）是转基因种子研发的领导者，但其在美国的广大农民心中可谓“臭名昭著”，许多农场主对孟山都在交易中设立的诸多严苛条款十分不满，农场主与孟山都之间的法律纠纷也绵延不绝。

即使抛开垄断企业利用市场力量“压迫”生产者这件事不谈，以私营部门为主导的转基因作物研发方式仍存在诸多问题。由于企业本身的牟利动机，其在研发方向上的选择势必要服务于未来利润的实现。具体而言，企业开发的种子一定是面向其最主要的销售市场，并相对局限于这一市场上的大宗作物。对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因地制宜开发的转基因种子将能带来更大的社会福利效应。然而在私营部门主导的研发进程中，这些种子很难出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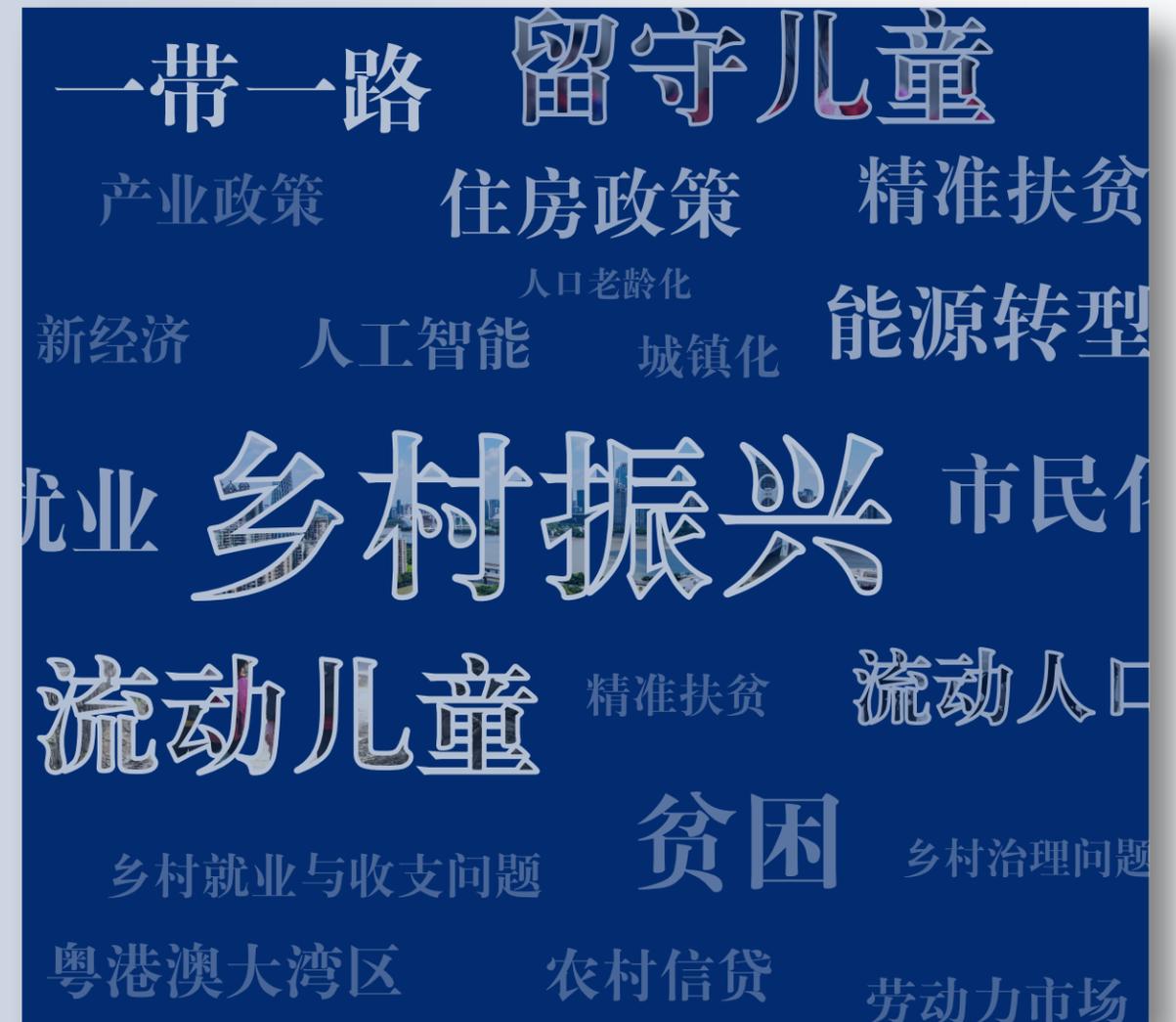
自上世纪 80 年代起步以来，我国的转基因技术研发一直由院校和科研机构为主导，研发重点立足于国情和我国农业发展的现实需要。我国转基因抗虫棉的自主研

发与应用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从社会福利的角度来看，相比西方以私营部门主导的研发模式，我国以公共部门主导的研发模式将更能符合我国农业发展的需要。同时，从国家的角度出发，通过院校和科研院所研发所形成的自主知识产权也有利于我国未来在转基因作物市场上的国际竞争。这些是我国在转基因农业长期发展中的优势。

然而，就短期而言，如果玉米等产业被迫迅速推动产业化，我们也将面对诸多挑战。从实验室和实验田转向大规模的商业化种植，这一过程中有许多风险点需要消化。一个首当其冲的问题是，如何区分和对待原先非法的转基因玉米和放开后合法的转基因玉米？这个问题一方面涉及到技术上如何去实现分辨；另一方面，也涉及到对现有法律法规的补充与完善。此外，产业化的实施也必将造成国外转基因种子的进一步流入，以及国内、国外转基因种子的竞争。这个过程中会不会面临知识产权问题的争议？我们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转基因种子又是否能够经得起一个开放市场的检验？

此外，人们通常关心转基因作物的健康风险，但对种植转基因作物潜在的生态环境风险重视不足。然而，在小规模的实验环境下，一些生态环境风险很难被充分度量。除了前面提到的“基因飘散”问题，大面积种植转基因作物还可能会降低区域内的物种多样性，使得当地的生态环境变得更为脆弱。种植转基因作物也需要面对虫害和杂草抗药性增强的潜在威胁。虽然抗药性问题并非转基因作物特有，但具有特定基因的转基因作物往往需要特定农药的配合，这意味着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农民无法轻易通过更换农药来缓解抗药性增强的问题。

虽然转基因技术本身是一个科学问题，转基因的产业化却涉及到各个领域的方方面面。不论从农业发展与粮食安全的大趋势出发，还是从目前国内转基因泛滥的严峻形势出发，与我国玉米等粮食作物转基因产业化有关的研究与讨论都已变得十分迫切。毕竟，留给中国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品牌活动

2019 年，研究院继续开展“大师暨南行”、“问政暨南”、“暨南论道”、“IESR+”等智库品牌活动。此外，与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智库之一布鲁金斯学会首次合作，共同举办“布鲁金斯—暨南中国微观经济学论坛”；连续第三年举办“第三届全国流动人口子女学术研讨会暨政策论坛”；与 GLO 组织共同举办“一带一路”劳动力市场研讨会。

广东千村调查 2018 研究报告发布会



冯帅章院长致辞

2019年1月10日,《广东千村调查2018年研究报告》发布会暨村长圆桌论坛在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举办。会议邀请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守英,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钱文荣作为点评专家,来自广州、清远、佛山、云浮的6位村委会代表受邀共同参与讨论。

《广东千村调查2018年研究报告》从精准扶贫战略、乡村治理、农村生态环境、教育脱贫、农村金融改革等角度出发,为广东省乃至全国的乡村振兴建言献策。

村庄概况与生态环境问题：

助理教授李承政的报告发现：农村公共卫生厕所及健身设施普及率不高；珠三角地区土地流转率最高，但租金价格却远低于东翼和西翼地区。在生态环境方面，揭阳、湛江和河源等地村庄的水土流失问题比较突出；家庭饮用水以自来水为主。农业发达的粤西地区，化肥施用和农业用药量最高；广东农村对秸秆的处理基本以焚烧为主，秸秆科学还田的比例很低。

乡村就业与收支问题：

副教授卢晶亮的报告发现：广东农村主要劳动年龄人口的就业率为59%，就业人员中受雇劳动者占52%。全年外出务工者的主要特征是已婚比例低、较为年轻、受教育程度较高。劳动力流动的主要特征是集中在省内尤其是珠三角地区务工。农户主要收入的来源依次是工资性收入、外出人员寄回来的收入、农业经营收入和非农业经营收入。消费最主要的构成依次是食品消费、医疗保健支出消费和教育支出。

乡村治理问题：

助理教授李书娟的报告发现：从基层的行政组织人员情况来看，广东省农村村委平均规模16人。从非正式制度来看，广东的宗族组织发达，潮汕地区尤为明显。从第一大姓来看，广东省行政村第一大姓的人口占比平均约为50%。另外老人会在广东农村地区也普遍存在。从治理方式来看，约70%重大的集体决策、决定由村民大会投票决定。报告建议在充分利用传统宗族文化服务乡村治理的同时，也有必要关注强大的宗族势力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

精准扶贫：

前助理教授牛梦琦的报告发现：精准扶贫户的选择注重“家庭收入”和“劳动能力”、“家庭负担”并重，农户社会关系对是否认定为精准扶贫户没有显著影响。珠三角地区精准扶贫户收到扶贫款的金额最低。扶贫八大工程中，村民参与社会保障扶贫和产业扶贫工程的比例最高。村民收到扶贫款主要是用于生活消费、看病医疗、子女教育等方面。

乡村教育：

助理教授韩昱洁的报告发现：广东农村的义务教育参与和完成的情况基本达到全国农村的平均水平。广东农村小学入学情况和在学情况都比较好，小学毛入学率与全国水平接近。广东农村初中毛入学率稍低于全国的情况，在学率只有95%。广东农村留守儿童比例为42.56%，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28.52%。报告建议提高农村义务教育水平，尤其是初中教育的控辍保学以及促进随迁子女的教育公平，同时在撤点并校后充分考量后续配套建设。



农村信贷：

助理教授马祥的报告发现：广东的农村金融很不发达，只有不到3%的调查对象最近五年内曾从正规金融机构借入款；不到1%的调查对象最近五年内曾从非正规金融机构借入款。40%左右的家庭最近五年内曾从其他个人那里借过钱，这其中60%左右的借贷存在于近亲之间。借款大部分是通过口头约定，很少签订正规合同。个人之间借贷主要为了稳定自己的生活水平。

嘉宾点评：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守英，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钱文荣进行了点评，他们认为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理解农户的行为是探索“三农”问题的关键，广东千村调查对乡村振兴提供了科学的决策依据以及全面的治理视野。广东作为发达地区，不同的区域处在不同的发展水平，调查所得数据的应用不仅对广东的决策有意义的，对全国来说也非常有意义。

▶ 第三届“全国流动人口子女学术研讨会暨政策论坛”



2019年4月18-19日，研究院于四川省绵竹市举办第三届全国流动人口子女学术研讨会暨政策论坛。本次会议由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绵竹市教育局共同主办，邀请了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暨南大学等机构的专家学者，以及全国一线教育工作者参会，共商流动人口子女发展大计。在政策论坛中，专家就流动人口子女相关研究领域展开了具有针对性的政策讨论。会上，冯帅章教授发布了绵竹项目2018数据成果报告。



嘉宾观点

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会影响贫困等社会问题的代际延续



王谦（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老龄健康司专员、中国人口学会人口迁徙与城市化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当前，流动人口在现居住地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子女上学。但因城乡二元结构，流动人口需要为子女教育付出更多的成本。因此，关注流动人口的子女教育问题极为重要。教育直接影响到流动人口子女自身的成长，如果成长受限，会引发贫困等社会问题的代际延续。面对当前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变化，政府及相关研究者应高度关注，继续做好监测和分析。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应综合各地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从行动研究到政策倡导



史耀疆（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实验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

政策倡导离不开行动研究，关键在于运用严格科学但简单的干预方法，通过随机干预实验的影响评估方法开展政策倡导行动研究项目。2008年起，史耀疆与研究团队开展了“营养、健康与教育”随机干预实验。结果发现，为农村学生提供维生素营养包的干预能降低学生的贫血率，同时学生成绩得到了显著提高。而短期内被提供营养包的样本儿童显著的提升了认知能力，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单纯的营养作用越来越小，因此需要在养育上进行更多的干预。

关注寄宿制学校的留守儿童



宋映宗（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在农村地区撤点并校集中教育资源背景下，农村地区的寄宿制学校及其在校生逐渐增加。但与此同时，寄宿制学生可能会面临学业发展、心理健康、校园霸凌、身体发育等问题。农村留守儿童非认知技能状态令人担忧，留守状态显著影响了儿童非认知技能表现，尤其是寄宿的留守学生可能有更高的抑郁风险。如果母亲外出，留守学生的各种非认知技能表现会更差。留守学生相对较差的非认知技能表现，将对他们的学业、身心发展有长期负面影响。

“中国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的转型、发展与挑战”圆桌论坛



2019年6月18日，2019世界计量经济学会中国年会在暨南大学举办，本次年会特设“中国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转型、发展与挑战”圆桌论坛，共7位房地产业学者、企业家分享了精彩观点。



中国房地产业和区域经济的转型发展挑战

邓永恒（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商学院教授）

今天中国房地产市场面临着诸多新挑战，同时也是全球的共同挑战。高房价在全球也是大家关注的一个话题，不能为居民提供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购买住宅的城市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因此，政府的管控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优化政府的管控模式，同时需要思考如何通过区域经济的发展模式来回应可持续发展、创新城市、城市间人口流动及老龄化问题等城市议题。



住房、人口老龄化与退休收入保障

方汉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系教授）

住房已经成为当今中国家庭财富的重要去向。但另一方面，中国未来面临着来自人口老龄化的重要挑战。目前的一个建议是使用反向贷款，通过使用家庭储存在住宅当中的财富，来应对不断上涨的房价，以确保居民退休后的收入。不过，中国家庭在文化上有传承子女的考虑，对于家庭而言亦很难从情感上接受。所以市场要考虑如何去调整相关的财务政策和金融政策，来出台更合适的贷款产品，去适应中国市场。



关注支付能力，完善住房供应体系

秦虹（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教授）

中国的住房发展成就不容忽视，但住房价格是需关注的风险点。下一步住房发展的重点是关注高房价下人民支付能力不足的问题。如何解决无房年轻人的住房问题，关系到整个社会稳定和发展。因此，政府提出要努力完善住房保障体系。这其中包括了三个层次：一是托底性的救济性保障，二是支持性保障，三是产权式保障。目前全国没有一个清晰完善的产权式保障政策，所以下一步急需完善明确支持性的产权式的住房保障政策，来弥补相应缺口。



人口性别结构与住房需求的关系

张晓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

研究发现，不管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家庭的收入和性别比例都是正相关的。如果未来放开计划生育，家庭有2-3个孩子，那么他们就可能不会面临严酷的性别淘汰，整个性别比例会变得更加平衡。首先，农村家庭要有权利去处置自己的房屋、土地。在城市当中，人们可能会卖掉城市里狭窄的房屋，到农村里住大房子。同时也可以吸引一部分移居到城市的农村年轻人回巢，让城市和农村的房地产市场形成互补或者良性互动。



创新型地区的住房发展策略

卢华翔（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住房与住区研究所所长）

创新人才群体的基本特征以中青年、中高收入群体为主，从事的行业集中在新兴行业。创新人才的住房需求以90平米以下的中小户型为主。毕业3-5年内的年轻人基本上是以租房为主，5年以后购房比例提高。创新人才群体的购房意愿非常强，所以当前以租赁为主的模式是不是完全能解决他们的住房需求。第一，需要用行政手段转向市场的手段来抑制房价；第二，要对城市的住房发展、住房成本有合理的控制，建立房价跟库存的双警戒线制度；第三，满足多元化的需求，建立可持续的人才支持制度。



房屋空置率背后的中国城镇化逻辑

甘犁（美国德克萨斯农工大学经济系教授，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院长）

2018年的调查数据表明中国大概有6500万的空置住房，21.4%的住房空置。为什么有如此之高的空置率？2010年以来，新增的35%的城镇化人口来源于对城市周边农村社区的重新划定。通过调查，实际上新的城镇化人口的底色还是农村人。研究发现，从90年代到2000年，17%的城镇人口增长可以被解释为自然增长，31%的城镇人口增长被解释为重新安置，或者是农村人口流动进城后转为城市居民，还有52%的城镇人口增长被解释为城市扩张过程中，城乡区域的重新划定带来的城镇化效应。农民工和迁居到城市里的人其实是两个不同的人群，不应该被放在同一个池子里相同地去对待。

▶ “外来人口市民化”研讨会



2019年11月15-16日，由中国人口学会人口迁移流动与城镇化专业委员会主办，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承办的“外来人口市民化”研讨会于暨南大学顺利举办。会议讨论了外来人口劳动力、医疗、子女入学、住房购房等方面的现状、政策问题。



城乡两栖现象——城镇化的第三条道路
王春光（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

流动人口与城镇居民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差异
卢晶亮（暨南大学）

**广州市流动人口卫生健康服务市民化进程中
宣传教育痛点、难点问题分析及对策建议**
葛国斌（广州市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办公室）

中国移民汇款：1995-2015年
梁文泉（暨南大学）

融入与挑战：在中国的东南亚跨境妇女
韩嘉玲（暨南大学，北京社科院）

我国特大城市人口调控时间与优化
刘厚莲（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粤港澳大湾区人口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侯佳伟（中央财经大学）

住房政策对农村流动人口城市住房支付能力与产权决策的影响研究
李欣（南京农业大学）

城市流动人口的异质性及生育率
张翠玲（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向上比较还是向下比较：中国流动人口的社会经济地位和主观幸福感
刘于琪（香港大学）

**农民工公共医疗服务选择的代际比较
——基于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苏浙沪三省数据**
汤兆云（华侨大学）

市场分割、地区差异与农民工创业收入效应
冯志坚（衡阳师范学院）

同伴效应：农村留守儿童的外部性
王海宁（中山大学）

**快速城镇化地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阶段与行为特征
——基于广东省东莞市的调查**
杜志威（广州地理研究所）

► “布鲁金斯 – 暨南 中国微观经济学论坛”

2019年10月11日-12日，首届“布鲁金斯 – 暨南”中国微观经济学论坛在 IESR 召开，这是研究院与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智库之一布鲁金斯学会的首次合作。来自布鲁金斯学会、亚利桑那大学、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未来资源研究所、康奈尔大学、清华大学、厦门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等院校的专家学者们齐聚 IESR，共同聚焦中国经济与政策领域的多项重要议题，通过深度讨论的模式为相关政策的制定与效果评估提供参考。本次与布鲁金斯学会的合作，是研究院在智库建设方面的又一次成功探索，为中国环境污染的治理模式提出了诸多思考，也为下一步环境治理的政策制定提供了新的思路。

以下为基于参会者论文以及政策观点整理而成的观点摘编：



以环保之名——城市二手车市场中的地方保护主义

Hui Zhou (Cornell University)

原文：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r Local Protectionism? Evidence from Tailpipe Emission Standard in China

2008年来国内各市陆续制定了二手车的限迁政策。研究发现：基于尾气排放标准的限迁政策，地方政府阻遏了二手车交易市场的良性发展，提高了本地品牌的汽车销量，但空气质量并没有因此而提高。2019年中国将落实全面取消二手车限迁政策——是否能打造“绿水青山”，真正提升公众福祉，前路漫漫，未来可期。

空气污染的溢出效应：基于中国制造业生产率的研究

V. Brian Viard (Cheung Kong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原文：How Extensive are Air Pollution Spillovers? An Application to China's Manufacturing Productivity

研究估计了粒径在10微米以下的颗粒物（PM10）对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污染不仅仅对本地的劳动生产率产生负面影响，对其他地方更是如此。在50公里内，PM10每增加1克/立方米，就会使企业的年平均劳动生产率降低了535元/人，这一影响在距离至1000公里后缓慢降至零。研究结果为空气污染的跨省治理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数据支持。



童年状况对老年认知表现的影响

Yao Pan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原文：Late-Life Cognition: Do Childhood Conditions Play Any Role?

通过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本研究探讨了不同童年条件对老年认知产生的不同影响。研究发现，其他的条件不变时，童年环境较差的老年个体在单词量回忆上表现更差。这一差距更是随着年龄增大而扩大，从而表明儿童时期状况对晚年的认知能力存在重要影响。

排污费征收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

Caixia Shen (Zhe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原文：Pollution Mitigation and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Chinese Manufacturing Firms

本研究评估了排污费政策变化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总体上看，排污费征收降低了环境污染，污水费征收降低了企业的生产率；废气费的征收并没有减缓空气污染；研究者发现排污费的征收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资本的生产率，但是降低了劳动的生产率。研究的结论探讨了环境保护与产业政策的有效性及其影响。

大气污染对体重和肥胖的影响

Peng Zhang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原文：The Effect of Air Pollution on Body Weight and Obesity: Evidence from China

研究发现，PM2.5对体重的增加具有正向影响。当PM2.5平均浓度每增加1克/立方米，BMI指数增加0.27%，超重率与肥胖率分别增加0.82%与0.27%。空气污染对肥胖的影响机制在于：空气污染减少了人们的日常体力活动，降低了步行的概率以及睡眠时间，空气污染也增加了脂肪的摄入量。相关发现也表明了大气污染对人们健康多方面的影响。

室内空气污染与死亡率：来自中国天然气管道扩建的证据

Wangyang Lai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原文：Indoor Air Pollution and Mortality Rates: Evidence from Natural Gas Pipelines Expansion in China

研究利用2004年至2015年国家疾病监测点数据，以及中国“西气东输”工程的政策时间差探讨了中国家庭使用不同清洁能源造成的室内空气污染对死亡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天然气管道的建设扩张降低了死于心血管疾病与肺癌的人数（42人/每10万人），由于农村女性往往负责做饭等家务活，她们受影响的程度更大。

火焰背后：秸秆焚烧对人力资本的非预期影响

Qu Tang (Jinan University):

原文：Behind the Flames: Unintended Impacts of Straw Burning on Human Capital

利用风向上的差别（上风向与下风向），本研究分离出焚烧秸秆带来的因果影响。本研究发现，农村的秸秆焚烧对学生的高考成绩具有短期的显著负面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成绩优异的学生，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承担着更多的压力。研究表明了空气污染的多方面影响，并且暗示了减轻农村秸秆焚烧带来的空气污染，有助于提高人力资本。

▶ “一带一路” 劳动力市场研讨会



2019年3月21日-22日，研究院与全球劳动组织（The Global Labor Organization, GLO）主办的 IESR-GLO “一带一路” 劳动力市场研讨会于暨南大学中惠楼 106 室顺利召开。这是研究院第二次与 GLO 进行深度合作，本次会议邀请了国内外知名高校的学者进行了相关论文的股份报告，共同探讨了“一带一路”劳动力市场问题。“一带一路”作为一项全球化议题，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双方希望搭建一个全球性的学术交流平台。“一带一路”建设不仅仅关乎南亚地区或局部地区，更是全球国家间的关系建构，此次会议增进了学者以及社会各界对“一带一路”的更深刻认识。



诺奖得主皮萨里德斯教授谈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市场影响



2019年5月21日，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塞浦路斯大学欧洲研究教授、塞浦路斯共和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Christopher Pissarides）来访暨南大学，并出席“大师暨南行”系列活动，作题为“Work in the Age of Robot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的主题演讲。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现状

人工智能领域的开发和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但直到21世纪才开始出现对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大量应用，如近年来流行的工业自动化、无人驾驶汽车、电子护照过关等人工智能技术。

皮萨里德斯教授指出，2015年全世界拥有机器人量约为180万，大部分机器人都是在中国使用，美国是50万个，欧洲是35万个。中国机器人的规模增长非常可观，但从人均拥有量的来看，实际上每万名员工的机器人拥有量平均只有1-2个。此外，中国的研发经费、教育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与日本、德国、美国等还有一定差距。皮萨里德斯教授强调，为了实现“中国制造2025”计划，中国应加大产学研合作，进一步加强教育研发投入。

大师暨南行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对人的替代性更强

皮萨里德斯教授提到，新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在不同行业发展中并不同步。目前新技术的发展仅局限于部分领域，例如汽车行业，还有一些领域依然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主。

接着，皮萨里德斯教授回顾了几次工业革命对劳动力产生的影响。他提到，英国在 18 世纪末实现了第一次工业化，后来出现了铁路、内燃机和电力，由此引发了第二次工业革命。20 世纪初，工业就业规模进一步扩大，但由于新技术的发展，工业就业人数在 20 世纪 70、80 年代开始下降，发达国家国家的服务业就业岗位逐步取代了原有工业就业岗位。而当前的技术是数字革命，与以往几次工业革命的技术突破相比，计算机对人的熟练工作替代性更强。它的关键要素在于能运用 AI 处理大量数据来执行可预测的任务，如已知疾病的诊断、驾驶汽车等的的数据输入。



我们的挑战：如何创造新的工作

行业的结构性转变都会包含工作的创造和消失，问题在于如何帮助我们的劳动力去适应这样的结构转型。经合组织（OECD）预测，未来可能 10%–20% 的工作会被机器人代替。皮萨里德斯教授分析了今后的职业变化趋势，他认为，像电话销售、贷款专员这类的工作已经在逐渐被计算机替代，而心理健康领域的社工、医生、护士这类工作则不易被替代，这类工作需要预测人的心理情绪，强调人的认知能力，现有的计算机技术与人工智能水平还无法精确替代人工。

皮萨里德斯教授认为，每一项新的创新都会使不同工作面临被替代的风险，因此无论是公司还是工人，都不可能完全对失业风险做到规避。不过，虽然很多国家都在进行机器人等新技术研发，但实施和推广则依赖于各国经济水平。

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时代下的工作时间与就业机会

皮萨里德斯教授认为，由于生产率的提高，人们不必要付出以往一样长的工作时间投入。从目前情况来看，生产力更高的国家依然保持着充分就业，这些国家劳动者的工作时间更短。许多工作以兼职的形式完成，人们可以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娱乐休闲上面。

在减少工作时间、保持高就业率的同时，大量新的就业机仍然会被创造出来。由于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服务是无法编程的，因此这部分的工作仍然需要大量人力。皮萨里德斯教授预测，大多数新的就业机会将在服务部门创造，例如保健、教育、酒店业、家庭和个人服务领域。随着社会变得更加富裕，人们的收入得到增长，部分行业的市场将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例如家庭饮食消费、家务消费、奢侈品消费和休闲消费等。

企业和政府如何提供帮助

皮萨里德斯教授认为企业和政府可以从三个方面应对新技术发展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首先是教育，为了新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我们需要在教育上加大投入，并进一步扩大此领域的研究、生产和维护工作。其次是培训，我们要促进公司、大学和政府之间的合作。最后，社交技巧在当今和未来社会都非常重要，许多未来的工作将需要社交技能，而招待业、照料儿童和老人等工作需要的社交技能教育和培训仍然很少，我们需要在培养此类社交技巧领域进行更大的投入。

Robert Moffitt：如何衡量贫困？



2019 年 6 月，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Robert Moffitt 教授来访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Moffitt 教授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经济系 Krieger-Eisenhower 教授，研究领域为劳动经济学与微观计量经济学。他担任北美劳动经济学会主席，计量经济学会院士，中国科学院国家协会院士，曾任国际顶级期刊《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主编，北美人口经济学会主席。在 Scienc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Econometrica,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等国际一流期刊上发表近 200 篇文章。来访期间，Moffitt 教授为暨大师生作了题为“The Measurement of Poverty”的讲座，围绕贫困的定义、不同国家的贫困率、反贫困计划是否引起了贫困陷阱三个话题展开论述。

首先，全球各国基本公认的是，贫困可以理解为缺乏维持生活基本需求的能力。但“基本需求”在各国的定义却存在差异，这更多地是一个社会范畴的问题。几乎全部国家都有官方或非官方的贫困线；人均 GDP 越高的国家，贫困线越高。其次，大部分贫困线都是基于消费计算而得。计算方法通常是先确定“基本需求”的最低消费组合，再根据每个商品的价格得到这个消费组合的总支出。虽然贫困线基于消费计算，但大部分国家是根据收入而不是消费支出定义贫困，因为消费支出难以在调查中准确衡量。最后，Moffitt 教授指出，定义贫困需要综合分析许多因素，包括生命周期、满足最低需求的消费、闲暇消费、价格变动等。

Moffitt 教授还比较了绝对贫困线和相对贫困线。绝对贫困线是从生存角度去定义贫困状态的。通常在选定基期后计算当期满足生活最基本需要的消费支出，根据时间推移更新价格而得。相



Moffitt教授与IESR院长冯帅章教授交谈

贺丹：关注人工智能对我国劳动就业的多重影响



2019年12月10日，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贺丹做客“问政暨南”系列讲座第11期活动，作了题为“人工智能对劳动就业的影响”的报告。目前我国的人工智能发展处于技术跃迁的前夜，经济、法律和政治因素将延缓人工智能发展的进程，为此加强对相关领域的研判非常必要。

贺丹从生产的资源聚合方式、生产组织方式以及劳动就业方式三方面阐释了人工智能发展可能带来的影响。首先是，借助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机器换人”发展，能促进劳动力市场供需平衡，减少当前我国就业总量压力；其次，借助自动化生产对高危、繁重工作的取代，人工智能间接加强了对劳动者的就业保护，将劳动者从繁重、高风险的工种中解放出来；再者，人工智能带来的资源聚合与生产重组能有效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并缩短劳动时间，从而增加劳动者收入；最后，自动化生产的趋势也能减轻劳动强度，使劳动者有更多闲暇时间去增加消费。

但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也对当前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带来的挑战。一是由于人工智能应用对劳动力技能提出了新的需求，可能会带来就业的替代效应，加剧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矛盾；二是人工智能发展带来新就业形态，对劳动统计监测带来挑战，例如平台经济下的灵活就业面临劳动法规监管难等问题；三是人工智能可能引发一系列伦理问题，例如人机协同的责任边界，信息安全与隐私保护等等；四是人工智能所产生的就业影响，将进一步深刻影响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问题。

贺丹教授认为，面临这些情况，我们应未雨绸缪。在就业政策、人力资源、服务保障、监测预警等方面，主动顺应人工智能发展趋势，满足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就业需求，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协同发展。

问政暨南

“问政暨南”系列论坛主要关注中国现实经济问题，以数据为基础，以政策研究为导向，为学术界、政策界和业界的专家搭建跨界交流的平台，共同探讨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的方向。

对贫困则是从与社会的一般福利水平比较的角度去定义的，因而会随着社会对“贫困”的认知变化而变化。例如手机是现代产品，在如今没有手机可能会被认为是“贫困”的，但是在20世纪初，没有手机不代表着你生活水平低。绝对贫困线的优势在于便于计算，更多地与最低生活条件相联系。若采用绝对贫困线来衡量，在一个经济持续增长的国家，贫困率势必会逐年下降。当采用相对贫困线来衡量贫困，例如以收入中位数的50%作为贫困线来衡量贫困率，我们可能看不到贫困率的下降。目前大部分欧洲国家采用相对贫困线，但发展中国家或低收入国家往往使用绝对贫困线。美国目前采用绝对贫困线作为官方贫困线。

不同国家的贫困率

美国的官方贫困率基于生活必需品的消费支出算得，不同规模的家庭，相应的贫困线也存在差异。目前，美国最新的官方贫困线为家庭（3人）税前年收入低于20,000美元，官方贫困率在15%左右。美国也有一个非官方贫困线，称为准相对贫困线（Quasi-relative poverty line），是根据食品、衣服、住房等商品的全国30%分位数对应的消费支出加总计算而得。准相对贫困线具有一定优势，比如当消费支出的分布发生变化时，贫困线也会自动调整。美国的官方贫困率（OPM）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没有出现下降，美国的非官方贫困率（SPM）随着时间推移出现下降。但同时Moffitt教授也指出，非官方贫困线的计算方法也需要随着经济发展而更新，因为食品、衣服、住房三种商品的支出所占收入的比例在逐年下降。

欧洲国家一般使用相对贫困线，比如使用收入中位数的50%作为贫困线衡量贫困率。世界银行定义的贫困线为，每人日收入低于2美元，或家庭（3人）年收入低于2190美元。这一贫困线主要适用于极端贫困国家，而不适用于高收入国家。依据该贫困线计算，世界贫困率1990年为36%，2015年为10%；中国贫困率1981年为63%，2015年为0.7%。

反贫困计划是否引起了贫困陷阱？

最后，Moffitt教授提到反贫困项目应该注意实施对象，也要避免“贫困陷阱”。

目前世界范围内有很多反贫困项目是普适的，比如建设基础设施、加大对教育和医疗的投入等。这一类项目是针对所有人的，但通常低收入人群获益更大。另一种反贫困政策则是仅面向贫困人群，更具有针对性。例如，印度大规模就业计划，就为低收入人群提供了就业保障。美国和欧洲也有许多针对贫困家庭的优惠政策，比如为低于一定收入的家庭提供食物、医疗、交通等方面支持。但同时，具有针对性的反贫困项目可能对于家庭脱离贫困具有抑制效应——它可能会减少家庭成员去工作以增加收入的动力，导致低收入家庭过度依赖减贫政策，陷入“贫困陷阱”。目前，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正在探索新的政策以减少反贫困项目的抑制效应，为愿意工作的家庭提供更多帮助。这一类激励政策包括为低收入工人减税，提供工资率补贴，提供儿童照顾、交通等援助。

Moffitt教授总结，反贫困项目的设计需要考虑许多原则，并权衡多方问题，通过分析美国的经验，希望可以为国际上的反贫困项目提供参考。



师生在认真听讲座

汪三贵：精准扶贫的现状和未来



2019年9月10日，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院长、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汪三贵教授到访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并为师生做了题为“精准扶贫的现状与未来”的讲座。汪三贵教授就扶贫政策的演变历程，精准扶贫的目标、内容、措施和难点做了系统而全面的介绍，并在最后探讨了精准扶贫的成效，分析了国家未来扶贫战略的走向。

中国的扶贫政策根据扶贫对象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从1986年到2013年的区域扶贫开发阶段，二是从2014年至今的精准扶贫阶段。区域扶贫开发是以推动贫困地区发展，缩小区域差距带动贫困人口脱贫为目标，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中国的区域扶贫开发虽然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但是这期间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为了解决贫困人口的生计问题，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的伟大目标，2014年，国家开始实行精准扶贫战略，确定了以贫困户为扶贫对象的精准扶贫机制。

汪三贵指出，精准扶贫的目标是到2020年解决现有标准下所有贫困人口的绝对贫困问题。目前，国家采取了产业扶贫、就业扶贫、生态补偿等多种多样的综合性扶持措施，助力精准扶贫的落实和推动。在精准扶贫工作开展的初期，对于贫困人员的精准识别问题存在着标准不明、方法不一等工作困难。在现阶段，精准扶贫中的问题主要是关于贫困户的“三保障”问题。而在2020年后，汪三贵认为如何确保贫困户的收入稳定和促进内生动力将会成为扶贫工作的难点。

在中央的大力推动之下，中国的精准扶贫成效斐然。主要表现在：一是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减贫速度不断加快；二是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实现快速增长；三是贫困地区农村居民生活条件不断改善；四是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条件不断改善；五是贫困地区的公共服务水平也得到了不断提高；六是改变了农村的基础治理方式。

最后，汪三贵与我们探讨了2020年后的扶贫战略走向。他认为，随着精准扶贫对绝对贫困现象的消除，贫困问题的重点将会转向相对贫困问题，未来农村的扶贫规划将会在乡村振兴的框架下得到进一步的明确和施行，城乡扶贫的步伐也将逐步向一体化的方向发展。在这期间，要更加注重贫困人口而的自我发展能力和内生动力的驱动，要更多依靠市场和专业性民间组织，并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齐晔：中国能源转型及其治理变革现状问题



2019年4月11日，“问政暨南”系列第九讲邀请了香港科技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齐晔教授。齐晔教授长期从事资源环境政策与全球气候变化研究，为师生分享了当前中国能源转型及其治理变革现状问题。

当前中国能源转型现状反映了七大趋势：能源消耗增速下降、煤炭消费达峰、能源强度下降、电气化趋势、天然气的比重提高、能源体系的低碳化，以及碳排放的可能达峰。齐晔教授认为，这七大趋势背后受四个经济因素影响。一是经济新常态。由于经济转向中高速增长，中国对能源需求的增长率有所下降。二是经济结构转型。中国经济增长结构中，第三产业比重的提高从根本上改变了能源使用结构。三是技术进步，可再生能源的成本下降非常快。四是绿色金融领域发展，尤其是中国在2009年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投资的国家。

同时，中国的能源转型趋势背后也受到政策影响。例如中国加强以节能与可再生能源为导向的政策制定与立法工作，同时在地方治理中加大对大气污染防治，并倡导绿色、低碳金融。这些政策导向，反映了中国政府关于生态文明施政理念、新工业革命以及全球治理上的发展思路。简而言之，当前中国能源系统正处于重大转型中，其趋势表现为去碳化进程与煤炭消费的达峰。国内能源现状稳定趋向实现《巴黎协定》上的拟定目标。这一能源范式的变革，背后受多种因素影响，其中政治施政理念与政策实践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

高文书：中国的新经济和新就业



2019年3月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人力资源研究室主任高文书研究员到访 IESR，并为师生分享了题为“中国的新经济与新就业”的讲座，这也是“问政暨南”第7期活动。高文书阐述了何为中国“新”经济、“新”就业环境以及新经济下的新就业环境面临的挑战。

何为“新”经济

新经济的“新”表现在由人工智能、大数据、“互联网+”主导进入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而我国的5G、共享经济等产业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第一梯队。由此，新经济环境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变化。高文书介绍，在中国，可以将新经济概括为“三新”，分别是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具体来说，新技术是指技术上的创新，如5G；新业态是运用新的技术或运营方式将之前旧的行业改革，如网约车。新经济带来的直接和间接效应占整个经济的GDP比重达20%以上，新经济的直接和间接效应都给经济带来了新动能。

何为“新”就业

在没有劳动生产率突变的情况下，经济增长会带动就业。根据测算，在新经济行业直接或间接工作的劳动力大约占就业人群的16%。新经济对就业岗位有创造作用，网店经营者、网约车司机、微商等个体私营劳动者比例在不断增加。由于新经济的比例不断上升，非标准就业比例随之增长，原有的雇员-雇主关系逐渐淡化，社会保障和劳动保护法律法规能够覆盖的劳动者范围逐渐变小。新就业的基本特征表现在：工作时间灵活、劳动者价值更好体现、工作模式变为“平台+个人”、数字技能要求更高。在新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就业极化”现象越来越明显。因此，有必要关注新经济带来的挑战：例如，就业创造、转移、损毁和折算的问题；新经济下劳动关系如何认定的问题；以及新就业的带来的社会保险问题等等。

江飞涛：中国产业政策的制定程序与组织机制——揭开中国产业政策制定的黑箱



2019年3月2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江飞涛来访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为师生带来“问政暨南”第8讲，分享了中国产业政策制定的相关问题。

江飞涛的报告介绍了产业政策的基本背景以及中国产业政策制定的程序与组织机制，分析了当前产业政策制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并提出了解决思路与建议。

一、产业政策制定的基本背景

产业政策这一概念，从不同的层次、尺度与视角来看，有着多种认识。传统意义上的产业政策，被称为选择性产业政策，此类产业政策主张政府对于市场进入、产品价格、生产要素配置与要素价格、投资等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而随后的功能性产业政策则认为，虽然政府仍应扮演重要角色并应采取积极行动，但应尽可能避免采用选择性产业政策，而是通过完善市场制度，改善营商环境，维护公平竞争等方式来实现以上目标。

纵观世界各国，不同地区国家结合各自国情与政体，采用了不同产业政策。例如欧盟地区主张一个在开放与竞争环境下的产业政策，政府有必要采取积极行动（“市场友好”的功能性产业政策）来促进产业创新发展及竞争力提升。而美国则采用了一个隐形的产业政策立场，美国政府的产业政策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但较少采用直接干预市场机制及竞争的方式。

二、中国产业政策制定的过程

回到中国的产业政策，中国的产业政策主要由产业结构政策、产业技术政策、产业组织政策与产业布局政策构成，并高度关注产业结构调整。中国产业政策的主要层级由三部分构成：第一层级是国务院颁布的产业政策；第二层级是国务院各部委的产业政策；第三层级是各级地方政府及部门所颁布的产业政策。

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赵金华教授 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经济学： 经验与展望



2019年4月11日，密歇根州立大学赵金华教授作客“暨南论道”公开系列讲座，第20讲分享了题为“Economics of Adaptation to Global Climate Change: Past Lessons and Future Strategies”的报告。

赵金华教授结合现有文献指出：气候正在发生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是由于人类以及人类活动所引起的。尽管存在区域差异，但全球平均温度呈现快速上升趋势。人类需要立即采取相关行动以减少温室气体（GHG）的排放，进而抑制灾难性的温度上升趋势。

当下主要有两种方式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减排（mitigation）与适应（adapt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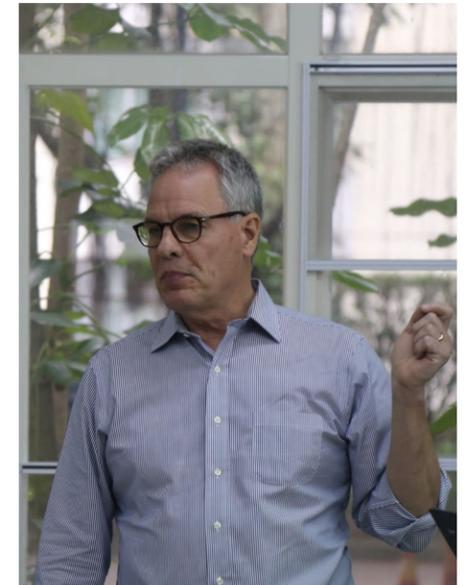
赵金华教授指出，目前经济学研究的重点主要在适应问题方面。赵金华教授也讨论了未来气候变化适应策略的设计原则。首先，现在的适应策略要为未来潜在的适应策略提供更多可能。其次，适应策略的设计需注重跨学科研究。除了供给侧的适应，引导需求侧进行变革也应成为适应气候变化的重要手段。以上这些认识对于中国制定适合自己国情的气候变化适应策略具有重要意义。

多伦多大学 Loren Brandt 教授谈中国经济前景

2019年7月11日，多伦多大学经济学教授 Loren Brandt 作客研究院“暨南论道”公开系列讲座第21讲，与暨南师生共同分享了题为“Prospects for the Chinese Economy: A Short and Long-run Perspective”的报告。

讲座开始，Brandt 教授指出中国经济短期内面临的一些挑战。金融危机后，中国通过信贷扩张刺激消费增长，这一政策带来了以下几个问题：部分产业产能过剩、僵尸企业、企业去杠杆、地方债务增加、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率和流动性等。

从长期来看，中国需要的是一个新的经济增长模型。回顾过去的发展，中国生产率的提高实际上来自于新企业进入市场。Brandt 教授指出，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生产率的进步逐渐消失。Brandt 教授的研究发现，减少产出关税和投入关税，可以提高进入市场的新企业的质量，从而提高行业总体生产率。最后，Brandt 教授总结，中国的经济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他表示相信中国的经济增速依然能够保持6%~8%的增长。但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现阶段的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改革？这些改革能否重现上世纪90年代改革的效果？



多伦多大学杨立岩教授谈金融市场中的信息摩擦问题

2019年7月12日，多伦多大学杨立岩教授作客“暨南论道”公开系列讲座第22讲，分享了题为“Financial Markets with Information Frictions”的报告。

在讲座的开始，杨立岩教授首先介绍了信息披露在金融市场中发挥的作用。现有的观点普遍认为信息披露可以通过加强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和减少投资者的逆向选择，进而增加市场的有效性和促进金融市场健康发展。而杨立岩教授指出，从长期来看，信息披露也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当“私有信息”转变为“公开信息”时，信息披露会挤出“私有信息”的生产，并对投资者决策效率和社会福利产生一定的影响。

针对于此，杨立岩教授认为，信息披露并非仅有单一的正向效应，而是取决于许多因素：长期或短期，公司成长方式、获得信息成本以及信息结构等。因此，监管者应当从多角度评估信息披露对金融市场的影响效应，以选择最优信息披露程度和信息披露形式的监管模式。



香港中文大学宋铮教授谈中国研发的未来走向

2019年9月20日，来自香港中文大学的宋铮教授作客“暨南论道”公开系列讲座，第23讲分享了题为“From imitation to innovation: where is all that Chinese R&D going?”的报告。

讲座开始，宋铮教授指出资源错配文献的来龙去脉，指出总TFP(增长)由企业TFP(增长)和错配(变化)决定。在中国，纠正分配不当可使总TFP水平提高三分之一。铮教授及其合作者建立模拟矩估计模型以拟合企业的研发投资行为以及生产率增长指标。通过比较中国大陆和台湾两大经济体，结果发现大陆的研发支出的投资回报率显著低于台湾，而产生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中国大陆企业捏造和夸大了研发费用，另一方面是与经济中的干扰造成的。最后，宋铮教授做了反事实分析：(1)如果所有企业都做研发，TFP增长会低于实际TFP增长，表明所有企业都参与研发并非最好；(2)消除经济中的产出干扰，会显著增加研发企业的比例及提高总体的TFP增长率。



北京大学徐晋涛教授谈中国增长模式转型再认识：一个环境经济学视角



2019年9月20日，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徐晋涛教授作客研究院暨南论道公开系列讲座，第24讲从环境经济学视角对中国增长模式的转型进行解读。

徐晋涛教授指出，当前我国面临空气质量和气候变化两大环境挑战，而已经出台的空气污染治理措施尚未取得稳定成果，中国作为碳排放大国需要更强的行动支撑。徐晋涛教授通过加入WTO对我国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来检验“污染避难所假说”，分析发现加入WTO后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世界排放量的比重陡然上升，并证实二氧化碳排放量大的行业大部分是资本密集型行业且在出口市场。

在经济增长放缓的新常态下，奇迹式的增长要向常规的增长转型的过程中，纠正要素价格特别是环境要素价格的扭曲是非常迫切的。采用经济手段而非行政手段，可有效地减少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排放，同时可提高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基于疾病防控需求的监测数据分析利用



2019年3月27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性病中心副主任，流行病学与卫生统计学专家周脉耕博士作客研究院 IESR+ 系列讲座，进行题为“基于疾病防控需求的监测数据分析利用”的分享。

讲座伊始，周脉耕首先简单介绍了我国面临的形势。中国正处在快速健康转型时期，面临慢性病和传染病的双重威胁，疾病防控是一项迫在眉睫的工作。而这一工作得益于当前技术水平，也有了许多数据支撑。我国的疾控检测系统和体系已经越来越发达。其次，周脉耕介绍了基于危险因素控制场景下的疾病预测情况。周脉耕博士举例说明了健康影响因素研究，尤其是前瞻性研究(CPS, CKB)，例如中国慢性病前瞻性研究项目(CKB)，包括糖尿病与死亡率的关系(JAMA)、辣椒摄入与死亡的关系(BMJ)等。最后，周脉耕博士以PM2.5对健康的影响研究为例，分享了环境与健康研究、干预(政策)效果方面的内容。

